

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植櫻與櫻花意象： 「內地」風景的發現、移植與櫻花論述*

顏杏如**

摘要

本文以日本人居住比例最高的臺北為範圍，嘗試運用當時的報紙、雜誌、旅遊手冊、報告書等，考察不同時期臺北郊山——草山（陽明山）櫻樹栽植的實態、思想流變及被賦予的意義，以此捕捉作為離鄉者的在臺日人與空間的互動、城市與郊野間生活內容和氛圍的川流。

從發現、栽植、移植櫻花的歷史過程可看到，早期櫻花對離鄉的在臺日人而言是「母國」、「故鄉」風物的象徵，當統治者首次移植日本內地的櫻花至臺灣也是基於想保護他們在「外地」發現的「內地風景」。然而在栽植和移植的過程中，櫻花在論述中被賦予許多符號與意義——「櫻花國」想像的合理化、日本內地名勝的投影、「內地延長」的聯想等。1920年代以後，希望藉由移植櫻花來培養日人永住觀念、避免二世、三世「灣化」等言論陸續出現，櫻樹的栽植與在臺日人在「外地」面臨的許多困境產生關聯。而企圖藉由移植櫻花來「同化」臺灣人並幫助「國民精神的昂揚」則是待至30年代以後才出現的想法。

這些現象說明了風景的規劃和空間的創造，除了牽扯權力運作外，更透露出人們思鄉、享樂的望想，或身處「外地」並非永遠居於優勢的危機感。人群與空間的互動、城—郊風景、生活中的種種行為也呈現「統治—被統治」以外更複雜、多樣的面貌。

關鍵詞：在臺日人、櫻花、風景、空間、臺北、城市生活

* 本文初稿〈殖民地時期的在臺日人與櫻花——「內地」風景的發現、移植與櫻花論述〉曾於2007年1月7日文化研究學會、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主辦，2007年文化研究學會年會「城流鄉動」宣讀。筆者向會議評論人朱惠足教授及兩位匿名審查人致謝，他們提供的寶貴意見讓本文更加完善周詳。

** 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課程

- 一、序言
- 二、山櫻的發現
- 三、統治者的植櫻
- 四、民間的植櫻與城市生活
- 五、臺灣人與櫻花
- 六、從風景到感化力
- 七、結語

一、序言

日本殖民時代的餘暉至今掩映臺北的天際，日式宿舍、歐風建築、老城牆遺址上鋪設的寬闊大路，皆構成臺北都市圖像的一部分。關於這個過往的殖民都市空間，既有的研究多著眼於身為殖民者、統治者的日本人如何規劃、設計空間，以此視角解讀空間中蘊含、展現的權力運作，對新附之民的統治教化與文明宣示等。此外，關注的焦點往往集中於建築、道路及其配置，植物所構成的景觀與空間較未受到注意。(1)

然而，若以「日本本土向外地移動的人群」重新檢視殖民時期居住在臺灣的日本人，那麼他們就不僅是一直以來所謂的「統治者」，而會呈現出更複雜的面貌。移徙的足跡，使在臺日人擺盪於日本「內地」與臺灣現地之間，他們於是置身「帝國空間」、「都市空間」等重層空間之中；他們的實質生活、與城市的互動、基於

(1) 關於殖民地都市空間與權力、支配統治的關係，已累積一定研究成果。可參見：徐裕健，〈都市空間文化形式之變遷——以日據時期臺北為個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土木研究所建築與城鄉組博士論文，1993）。蘇碩斌，〈臺北近代都市空間之出現——清代至日治時期權力運作模式的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葉倩瑋，〈植民地主義と都市空間——台北における權力と都市形成〉，收於竹內啟一編，《都市・空間・權力》（東京：大明堂，1996），頁34-76。另外少數自生活者的角度討論人們對臺北都市空間的認知與感受，例如，邱函妮透過畫作的考察。參見邱函妮，〈街道上的寫生者——日治時期的台北圖像與城市空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其慾望與想像營造的空間，除了統治與被統治的構圖和權力的運作佈置之外，還與如此的時空背景交織相疊。

在臺日人的書寫，經常可見「文明」、「權力」、「現代性」的誇示，但另一方面，身為「殖民者」，同時亦為由日本本土向外移動、自身捲入「中央—邊陲」價值機制中的「移動者」、「離鄉者」來說，風景的描述也往往隱含了自己「活在文明的中心，而非邊陲」的宣示。此外，作為外地生活者，他們亦不斷將視線投向具有「南國風情」的景物。對於南國的憧憬與想像，也反向地造就了蒲葵、椰子樹等熱帶植物成排的都市景觀。⁽²⁾ 如今臺北呈現的許多風景，仍然蘊藏了昔日在臺日人對南國的認識與想像。

與這些以「南國象徵」被大量、刻意栽植的蒲葵、椰子等行道樹形成明顯對比的，則是移植於都市外緣山丘，象徵日本風物的植物——櫻花。近年臺灣流行的賞櫻雖不能說源自日治時代，但是主要的賞櫻景點，陽明山、阿里山、烏來、霧社、埔里等地當時便已經以櫻花聞名。也就是說，曾經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日本人，他們的想法、作為及生活，不僅大大影響了當今臺灣的風景，也間接與現今臺灣人的生活繫於一線之兩端。

本文即以日本人居比例最高的臺北為範圍，考察日治時期圍繞著櫻花的種種行為和活動，以及當時人們對櫻花的品評論述，試著解明自「日本本土向外地移動」的在臺日人，臨對新領土之際，除了權力的運作之外，還有哪些動力、因素影響了風景、空間的創造？身處海角一隅，櫻花對在臺日人的意義、意象如何建構，其轉折變遷歷程為何？希望透過人們心田身畔櫻的花影，捕捉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生活的浮光掠影，進一步理解如今我們習以為常的城—郊風景之所由來。

筆者試圖循兩條脈絡考察櫻花與在臺日人的關係。一是櫻花栽植的意圖與意義。更具體而言，筆者想探問，對在臺日人而言，隨著不同時期、不同階段在臺灣發現、栽種、移植櫻花，其動機、歷程及隱含的意義為何？緣於對日本人獨鍾櫻花的認識，這個提問也許馬上令人聯想到武士道、日本精神的移植——崇尚如櫻花般瀟灑謝落，一種對死亡美學的禮讚。但這樣的認識與意象在臺灣是何時、

(2) 顏杏如，〈「島都台北」に生きる——殖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外地経験と異文化接触〉（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修士論文，2003），頁 33-45。

如何被賦予、建構，本身亦是一個必須釐清的問題。⁽³⁾ 另一脈絡則是櫻花與「外地」生活、景觀創造的關聯。亦即，櫻花在日常或非日常的生活上，以何種角色活躍於作為統治者同時也是離鄉者的在臺日人為其搭設的舞臺？大量栽植的櫻花在都市及其外緣創造出什麼樣的風光景致？而日本人這些舉動、生活方式，以及景觀、空間的創造，又對當時的臺灣人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筆者嘗試運用當時的報紙、雜誌、旅遊手冊、報告書等，考察不同時期臺北郊山——草山（陽明山）櫻樹栽植的實態、投向櫻樹的目光，也探問這些舉動蘊含的言論想法，以及凡此種種的變遷—延續痕跡。希望透過從來非歷史要角的在臺日人大眾和構成城郊風景一環的櫻花，顯映出日治時期城市與郊野間生活內容和氛圍的互動，窺探「人群—空間—文化」交織而成的生活處境與時代心理。

二、山櫻的發現

閱讀 1920 年代以後關於草山的介紹，或者基於平日對陽明山櫻花的一般認識，很容易誤以為山間株株櫻樹皆由日治時期日本人栽植（當然也有可能從沒想過陽明山的櫻花是怎麼來的，理所當然地賞著花）。⁽⁴⁾ 事實上，臺灣溫度較低的山區本就生長著原生的山櫻花，⁽⁵⁾ 不過那樣的山地風情對初領臺灣的日本人來說，

-
- (3) 日本史關於櫻花意象、思想的變遷，有相當的研究成果。例如，大貫惠美子詳細分析櫻與國族主義、軍國主義的關係，並檢驗國家意識灌輸的櫻花意義，與特攻隊員讀取的櫻花意義之間的落差。參見：大貫惠美子，《ねじ曲げられた桜——美意識と軍国主義》（東京：岩波書店，2003）。另外，自古代以來櫻花的歷史、文學上的書寫表現，有山田孝雄，《櫻史》（東京：櫻書房，1941）；小川和佑，《桜と日本人》（東京：新潮社，1993）等。不過這些著作主要都是以日本為範圍的討論，對「外地」的植櫻或有言及，也僅止於簡單的敘述。以臺灣為對象的報導文學，平野久美子，《トウサンの桜》（東京：小学館，2007）採訪了一位戰後仍持續栽植櫻花的「日本語人」，但平野旨在描述戰前世代仍深植於心的「日本精神」，以及活過兩個時代遭遇的種種悲哀與困境，櫻花與日本精神之間的關聯仍待更細緻的考察。
- (4) 例如，一本市面上以賞櫻為主題的旅行雜誌，即以日人想將賞櫻文化帶入臺灣，和 1940 年的種櫻運動，使陽明山區遍佈櫻花，說明櫻花的由來。這樣的說法恐怕也是一般最普遍的印象。參見陳慧如，《臺灣櫻花旅行》（臺北：莫克文化，2004），頁 7、12。
- (5) 山櫻這個名稱在戰前呈現同心圓狀三個層次的意味：最外層是指非園藝品種的自生種櫻花全體（如彼岸櫻、緋寒櫻、山櫻等等）；向內的第二層是指自生種櫻花族群其中之一的「山櫻群」；最核心的層次是指「山櫻（*Prunus jamasakura*）」這個品種。（參見：佐藤俊樹，《桜が創った「日本」——ソメイヨシノ起源への旅》〔東京：岩波書店，2005〕，頁 3、143）另外，臺灣的緋寒櫻（緋櫻）也稱山櫻花。在這裡筆者指的是同心圓最外層非園藝品種的自生種櫻花。

仍是未知的世界。隨著地方官的視察、討伐藏匿山區的抗日軍、番界探險、理番推進、生物學者的採集，當初意想不到的風景才漸次在眼前展開。例如，羅羅山（拉拉山）的櫻花是1909年番地探險隊入山時發現。同年，隨佐久間左馬太總督赴南投巡視的總督府技師川上瀧彌（1871-1915）發現了霧社櫻。1910年巡視大南澳鳳沙（紗）山隘勇線的宜蘭廳長小松吉久（1867-？）發現蘭坎山巔開滿了緋櫻。⁽⁶⁾臺灣原生的山櫻就在這樣的過程中重新被「發現」。

（一）故鄉的身影

竹子湖的櫻花便是在討伐抗日軍之際發現的。1896年到1899年，簡大獅（1870-1900）的抗日軍以草山一帶為據點，持續與日軍進行游擊戰。戰事中，記者隨軍隊進入山區，可以推測，櫻花的情報可能即經由記者之間的訊息交換輾轉傳開。櫻花被發現後，記者們如何描寫這意外的世界呢？其目光與視線中透露出何種訊息與想法？

竹子湖櫻花首次被報導的紀錄在1897年左右，筆者所見最早的一篇報導是1900年刊於《臺灣日日新報》，以〈臺灣的櫻〉為題的一篇短文：

生於足以自豪盡在櫻樹間的東洋櫻花國，然以此身遠赴南溟之地，春天的心情亦不恬靜，儘抱怨著無櫻的此地春天之寂寥。偶然聽聞櫻花的音信已然欣喜。乃沿距臺北僅四里餘之金包里街道，出草山，右折，循羊腸小徑，即達名為竹仔湖之佳地。此處北邊山頭滿目櫻花，與相思樹枝頭相接，覆蓋涓涓溪流，連綿七八町，⁽⁷⁾望之宛若一朵錦雲橫互。……其花形與內地稍異，單瓣，濃紅，初見如紅梅，其香味馥郁，更有勝內地櫻。欲自臺北前往賞櫻，先搭人力車到士林（車資十五錢），此處至草山一里處有士林派出所，在此稍歇後僅二里路程，即得以一日清閒賞櫻。⁽⁸⁾〔按：底線為筆者所加，以下均同。〕

(6) 〈羅羅山櫻樹〉，《臺灣時報》（漢文），第4號（1909年7月），頁103。〈羅羅山の櫻花〉，《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5月9日，第7版。〈臺灣の櫻〉，《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2月22日，第3版。〈蘭坎山巔の緋櫻〉，《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1月28日，第5版。

(7) 一町約109公尺。

(8) 〈臺灣の櫻〉，《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3月13日，第4版。原文為日文。

1901年8月之前，淡水線鐵路尚未開通，欲往竹子湖賞櫻，必須先搭人力車到士林，再徒步健行攀爬。若早晨七點從臺北出發，到達目的地大約已是下午一點左右了。⁽⁹⁾ 儘管是一段崎嶇不易的路程，但聽到櫻訊仍不辭千里前往，一切只因生於國土「盡在櫻樹間的東洋櫻花國」，「沒有櫻花的春天寂寥」。驅策千里迢迢探訪櫻花的動力，可以說是「東洋櫻花國」這個自我象徵所引發的。

引文中還提到了櫻花花瓣的形狀、色彩和日本內地的櫻花殊異這個景觀上的差別。日本明治時代以前，隨著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櫻景色，不過無論西日本分布較廣的「山櫻 (Prunus jamasakura)」系統，或是東日本的江戶彼岸櫻，日本常見的幾種櫻花都是淡粉色。而竹子湖原生種緋寒櫻則是色彩濃艷的緋紅色，花形下垂呈吊鐘狀。另一方面，江戶末期才出現的染井吉野，在明治一〇年代左右開始在東京流行起來，並以極快的速度席捲整個日本列島。染井吉野的特色是花期較短且齊開齊落，這使得明治以後的日本人逐漸習慣這種春景色。⁽¹⁰⁾ 比起染井吉野，緋寒櫻不但顏色深，花瓣小，花期也顯得很長，沒有謝落時的瀟灑之感。由於我們不知道作者的出生背景與年歲，無法進而推測其習慣的櫻景色屬於何者，但緋寒櫻所構成的風景無疑和日本內地大異其趣。然而作者由文中所傳達出的，不但不是美中不足的遺憾，反而是南方小島櫻花特有的魅力，以及和綠樹相偕構成的美景。

在這篇短文之後，當時尚未成名勝的竹子湖相關介紹，以及前往探勝的紀行文陸續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其後探訪的人們則常以「其花瓣不大，花少，隔一町望之便無法辨其是否為櫻樹」，或「唯怨此地櫻花，與母國之物相較，其花，其色，其樹皆相異，因此其花不似白雪無風情，其色不留風貌無芳香，其樹不借宿無梢，此三點也。……總之恰與母國的桃酷似。詩中所看到的櫻桃不正是此物嗎」等之類的說法描寫櫻花。文句中往往流露出美中不足的感嘆與遺憾。⁽¹¹⁾ 這些遺憾讓我們窺見，記述者往往抱著可以看到與「內地相同的風景」的期待前往竹

(9)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臺灣鐵道旅行案内》（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1930），頁47。〈竹仔湖庄の櫻案内〉，《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3月1日，第5版。

(10) 關於明治以前的櫻景色與染井吉野的崛起，參見佐藤俊樹，《桜が創った「日本」》，頁5-8、87-103。

(11) 〈竹仔湖庄の櫻案内〉，《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3月1日，第5版。〈花のしおり〉，《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2月22日，第3版。

子湖，抵達之後卻發現映入眼簾的，與心中所想、所描繪的「內地風景」存有相當的落差。

一段企圖糾正偏狹看法的言論，生動地反映出在臺日人普遍的目光與心情：「若日本的櫻花是姬君（公主），則臺灣的櫻花像抹了胭脂的鄉下少女，不懂得調整色彩，以致缺乏格調，這種看法是由於偏見啊。話雖如此，應可追懷故國的春天……。」⁽¹²⁾ 對臺灣原生櫻花的感受雖存在褒貶兩面的評價，但無論傾心於南島櫻花之美，抑或感嘆風情不如日本內地，對於離鄉背井的在臺日人而言，櫻花是他們懷鄉的憑藉。探勝的過程中，竹子湖的櫻花不斷與日本內地櫻花爛漫的春景色層疊映現，呈現出「櫻花=母國風景、故鄉風物」的構圖。

（二）「櫻的國土」之轉化

而這樣的構圖得以成立的前提，則是「日本=櫻花國」這個自我象徵的存在，就像〈臺灣的櫻〉中自稱「東洋櫻花國」，其國土「盡在櫻樹間」一般。

回身探尋此一表徵的萌芽，可以追溯至西元 8、9 世紀之交。8 世紀以前，熱衷倣習漢唐文明的日本貴族欣賞的是從中國傳來的梅花，「美的價值」亦承襲自中國。⁽¹³⁾ 9 世紀中葉起歷史脈動有了轉換：孕育日本獨自繪畫傳統的大和繪抬頭，以及兩百多年以來的遣唐使制度廢止等背景之中，梅花凌駕櫻花的趨勢到了平安時代（794-1185）開始逆轉，《古今和歌集》中櫻花的詠讚已遠遠超過梅花。⁽¹⁴⁾ 這些動向說明，在與他者（中國）接觸過程中——導入先進文明的同時又欲確立自身的文化認同——貴族們汲取了民間「美的價值」取代了中國傳來的梅花的地位。櫻花即於如此過程中被選取，成為自身認同的隱喻與象徵。⁽¹⁵⁾

(12) みやかは花守，〈造り花「士林より」の二〉，《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3 月 1 日，第 4 版。

(13) 日本現存最早的歌集是 7 世紀後半到 8 世紀中編纂的《萬葉集》，其中收錄詠嘆梅花的作品 118 首，詠櫻的卻只有 44 首。參見齋藤正二，《植物と日本文化》（東京：八坂書房，1979），頁 42。

(14) 田中秀明，《桜信仰と日本人——愛でる心をたどる名所・名木紀行》（東京：青春出版社，2003），頁 27。《古今和歌集》是醍醐天皇（897-930 在位）詔勅編纂，為日本最早的勅撰和歌集，西元 905 年完成，輯錄了此前 140 年間的名歌。

(15) 另一個可以說明這轉變的是皇居御所寢殿的植櫻。即紫宸殿的南庭，左側種櫻，右側種橘。這兩棵樹分別象徵左、右近衛府，是歷史上紫宸殿的一個重要意象。不過，直至西元 794 年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京（京都）之際，紫宸殿前所植的都還是梅樹，到了 9 世紀中葉開始才換植櫻樹。從「左近的梅」換成「左近的櫻」並非偶然，與日本上流階級對中國態度的轉換有著很大的關聯。參見大貫惠美子，《ねじ曲げられた桜》，頁 103-108。

將櫻花推進為日本的象徵，使「櫻花國」成立，則是要到江戶時代（1603-1867）。德川家康（1543-1616）、秀忠（1579-1632）、家光（1604-1651）等多位將軍下令在江戶（東京）各處種植櫻花，幕府的目的是在江戶新都城培育古都京都的櫻花，仿造古都意象以作為新首都的景觀。⁽¹⁶⁾此外，藉由參勤交替⁽¹⁷⁾的制度，大名也將各地特有的櫻花帶進江戶，江戶化身為「花之都」。「櫻的國土日本」之構築也在此後透過浮世繪的視覺表現更向前推進一步。日本無論在現實上，或是自我象徵上，都成了「櫻的國土」。⁽¹⁸⁾江戶時代著名的儒學者，也是植物學者的貝原益軒（1630-1714）在其著作《花譜》（1698年）中引用清人的證言，發表道：中國沒有櫻花。⁽¹⁹⁾植物學者的宣言既說明了當時代的認識，也更深化「只有日本有櫻花」的想像。

儘管明治初年致力於「現代化」時，有人認為櫻花體現的是過去、是封建主義，而出現砍伐燒虐櫻樹的現象，但在這樣的狂瀾中相對地也出現視櫻花為日本的價值觀、傳統，加以保護，甚至增植的動向。櫻花在明治初年依然是「文化上的」（而非政治上的）民族主義中的重要隱喻。⁽²⁰⁾染井吉野櫻的出現，更使得「櫻的國土」之感覺深切實在。江戶末期才出現的染井吉野，由於培育迅速容易，明治二〇年代開始，廣泛運用於公園、堤防、城廓等景觀的整備。染井吉野的廣泛栽植，恰巧與一個強調「日本」的時代重疊，但其擴大的機制，應歸功於其品種的魅力——嶄新。染井吉野的崛起，可以說掀起了一場革命，它讓原本不同的土

(16) 小川和佑，《桜と日本人》，頁21。神崎宣武，《物見遊山と日本人》（東京：講談社，1991），頁24-25。

(17) 各藩的大名定期到江戶出公差。是江戶時代統治大名的制度，其目的在弱化大名的經濟力，防止各藩謀反。

(18) 「櫻的國土」在構築和象徵的過程中，浮世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最有名的浮世繪——安藤廣重（1797-1858）的《名所江戸百景》（1856-1858）為例，118處「名所」圖繪中，有21處的「名所」是因其櫻花之美成名；相對的，梅花只有4處。若加入日本視覺藝術使用各式各樣花卉來表現每個月份的習慣來考慮的話，只有短暫綻放的櫻花在118名所中出現了21處，是值得注目的。換言之，那些神社佛閣以及其他的場所之所以被選為名所，櫻花為必要條件。（參照大貫惠美子，《ねじ曲げられた桜》，頁109-113）另外，大貫認為富士山、水田亦是日本人選取的自我象徵。相撲力士和藝妓的題材當初是因受大眾歡迎暢銷而畫，並非為了象徵日本，然而日後卻逆向透過西洋人的眼睛，轉化為日本的象徵。

(19) 貝原益軒，《花譜·茶譜》（東京：八坂書房翻刻元祿七年—寶永元年刊國會圖書館白井文庫藏本，1973），頁31。參考大貫惠美子，《ねじ曲げられた桜》，頁110。事實上，無論中國，還是世界各地，都有櫻花。

(20) 大貫惠美子，《ねじ曲げられた桜》，頁171-176。

地變得「均質」，「一個國家」、「一個時間」、「一個學校系統」成爲可能。⁽²¹⁾

在臺日人自認生於「東洋櫻花國」，這個看似不辯自明的想法、觀念實由如此的歷史脈絡一路延續而來。於是，隔海的「外地」生活，櫻花則成爲母國、內地風景的象徵，幻化爲望鄉之花。更值得注目的是，臺灣也發現櫻花此一事實並未與「櫻的國土」這樣的象徵產生衝突，反倒以另一種形式被轉化、解釋。1897年渡臺的古典詩人中村櫻溪⁽²²⁾於其〈竹子湖觀櫻花記〉（1902）寫道：

櫻花者。我神州清淑之氣所磅礴鬱積而生也。故海外諸邦有此花者希。而臺疆特有之。豈以其風氣有所相通而然耶。……獨惜櫻樹僅不過二三十章。而土人伐採。出鬻之市。遊人又有折枝者。苟不爲之禁遏。恐將歸殘滅也。……余筆示約。此花是天下名葩。勿伐勿折。謹護之以爲此土之寶。其人怡然而頷。似有所解者。夫臺疆之闢。實由我浪遊之士。而鄭成功以我婦人之出。據以倡義。則櫻花之產於此土者。其豈偶然。今夫香魚臺人呼爲國姓魚。傳言自鄭氏入臺始有之。見淡水臺詩余未知其信然否也。然風氣由人工而開。風氣之變。動植亦化。果然。此花之生。其亦由我游士佔據之日歟。嗟吁余觀此花。而知臺疆之歸神州者有故矣。⁽²³⁾

儘管竹子湖的緋寒櫻是臺灣原生的櫻花，且被在臺日人認爲無論形狀或色彩都和日本內地的櫻花相異，但櫻花是「日本特有的」這一想法在這篇文章展露無遺，作者的論述也是在這樣的基調下展開。

值得一提的是，以「日本特有的」視線與目光捕捉臺灣原生的櫻花，中村並非特例。同時期的記事或漢詩，也經常可以看到使用「大和櫻」、「扶桑種」等詞彙指稱竹子湖的櫻花。此外，對樵夫斧下的櫻樹投予無限憐惜和保護之意則是這些文章的共通之處，甚至在竹子湖身上投射了以櫻花聞名的吉野山（位於奈良縣）

(21) 佐藤俊樹，《桜が創った「日本」》，頁64-126。

(22) 原名忠誠，生卒年不詳，字伯實，東京人。明治30年（1897）來臺。曾出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教諭。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灣文學辭典》，線上版，http://www2.nmtl.gov.tw:8090/ug-9.jsp?xsd_name=entry&handle=1430。

(23) 中村櫻溪，〈(詞林) 竹子湖觀櫻花記〉，《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4月16日，第1版。

的意象，認為應該收購整座山頭，伐「雜木」、除「穢草」，將之建置為「小吉野山」。⁽²⁴⁾ 根據佐藤俊樹的觀察，對日本人而言，「吉野的櫻」所表述的不是現實上的櫻花，而是想像上的名所，是作為一種符號被使用、敘述的。⁽²⁵⁾ 那麼對在臺日人而言，「小吉野山」就不只是日本內地的符號，亦是想像中母國櫻花名所的複製與地標的對應了。

同樣基於「櫻花是日本特有的」這樣的視線與構圖，中村的論述則更出人意表。他認為臺灣之所以有櫻花，乃因與日本風氣相通；並且更進一步由帶日本血統的鄭成功連結臺灣與日本的關係，類推、斷定臺灣歸於日本所有乃由於「日本特有的」櫻花亦生長於此。在此，櫻花遂化身為另一層意義的「櫻的國土」的象徵——有櫻花之處終會納入我領土，原本向內圈定界線的行為轉而向外。這種藉由言論的轉化和解釋，與日俄戰爭後透過具體行為向滿洲等地移植櫻花，重新標示新領地、象徵性宣示「日本之空間」的方式雖有不同，卻具有異曲同工之效。⁽²⁶⁾ 臺灣之有櫻乃因與日本風氣相通的說法，也在領臺初期不斷被沿用與複製。⁽²⁷⁾

(三)觀櫻會

1900、1901 年左右的觀櫻記、紀行文經常詳細記述竹子湖的所在位置及如何前往，可見領臺之初幾年，竹子湖不僅人煙罕至，知名度亦不高。新聞報導和紀行文本本身便具有宣傳的效果，透過這些記事，竹子湖的櫻花始漸為人知。從那些

(24) 例如，「屯山之下竹仔湖。……此花原是扶桑種。嘗近紫宸邀君寵。不知流落自何時。來與黃茅共一隴。可憐真賞竟無人。儘被樵夫採代薪。曙光映出絕塵姿。輸與凡桃能避琴。君不見芳山千樹鄉香雲吐。長護帝陵不入斧。那禁此處讀摧殘。天上願搬續命縷。」（引自衣洲植客，〈折花嘆〉，《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3月5日，第1版）。希望購山建置小吉野的原文為，「それとて彼儘に放任して置けば、あたらよからうと大和櫻も到底根絶を免れぬ、可成は彼の山を買入れて雜木を伐り穢草を蒔り小吉野山をでかしたたらよからうと思ふ」（鷺の家，〈櫻の述懐〉，《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3月3日，第7版）。旁點為筆者所加。

(25) 吉野的櫻自平安時代以來便經常被吟詠，但人們未必都親眼目睹。甚至吉野山現實上的景致也不及其名聲上的。參見佐藤俊樹，《桜が創った「日本」》，頁43-49。

(26) 大貫惠美子以滿洲為例，指出在侵略地尋找原生的櫻花、移植日本的櫻苗等，是一種宣示「日本的空間」之行為。不過對於這樣的行為、象徵意涵、植櫻的過程等，大貫並沒有做更細緻深入的考察。參見大貫惠美子，《ねじ曲げられた桜》，頁197-198。

(27) 例如，「若天氣晴和。或逢禮拜日。臺北城市之官紳商人。僭婦女。攜酒食。來飲於櫻花下。以盡遊觀之樂。咸〔咸〕謂櫻花為神州清淑之氣所磅礴鬱積而生。故海外諸邦。鮮有此花。而臺北特有之。殆以風氣之有相通歟。」（〈竹子湖之櫻樹〉，《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3月13日，第5版。）

報導和紀行文，也可看到當時賞櫻的情景與性質。中村櫻溪在〈竹子湖觀櫻花記〉描寫當日與同伴前往竹子湖觀櫻的情景：

侶中有帶獵槍者。行打小禽。路入山間。數遇放牧水牛。魁貌巨角。九十成群。……涉溪流攀羊腸。得一小村。即為竹子湖。……沿七星山麓而邱阜一帶。翠松青竹。與雜木相綺錯。而櫻樹散點於其間。……就村中稍高處而休焉。誅茅篋集楮柚而焚之。炙所獲之禽為下物。傾瓢酒共飲。(28)

「賞櫻」（花見）在江戶中期的町人⁽²⁹⁾社會遊興文化已逐漸大眾化，此前文人間盛行的是欣賞單株名櫻。至 18 世紀中葉，櫻樹下群集賞櫻已極為盛行，幕府刻意植栽櫻花的上野、小金井、飛鳥山、向島等地，江戶時代中期以後和明治年間，一直都是庶民群集賞櫻的熱門場所。這種賞櫻模式是江戶特有的庶民文化、都市創造出來的祝祭空間，也是延續至今春櫻樹下熱鬧飲食歌唱談笑的賞櫻活動的原型。⁽³⁰⁾不過，在農村社會，賞花卻是和春天的山遊、野遊結合的。人們舉村登高，遊山野宴，抽離日常生活的鄉里，在異質的場所，上演著非日常的春之祝祭。⁽³¹⁾因而，中村這篇觀櫻記所描述領臺初年的賞櫻，與我們熟悉同時期日本內地的賞櫻活動看似大異其趣，實則仍匯入了來自日本傳統源流。因著交通、自然環境等外在條件限制，雖無日本內地的「群櫻」，亦未「群集」，⁽³²⁾然千里跋涉與樹下暢飲共食，依然可辨識出江戶風俗的痕跡；沿途打獵攀爬，抵達目的地後燒烤所獲獵物，更見農村社會野遊的成分與性質；「侶中有帶獵槍者」則透露出一道賞櫻的夥伴們並非來自同一出身地。出自日本各地有著不同風俗習慣的在臺日人們也帶進了各自家鄉的習慣，讓早年的竹子湖賞櫻夾雜了迥異的地方特色。

1901 年 8 月淡水線鐵路開通，從臺北到士林不必再依賴人力車，往返的時間大幅縮短，只消 15 分鐘。但士林與竹子湖之間，依然綿延著崎嶇蜿蜒的山路。簡

(28) 中村櫻溪，〈(詞林) 竹子湖觀櫻花記〉。

(29) 江戶時代居住在都市的職人、商人。

(30) 神崎宣武，《物見遊山と日本人》，頁 20-26。

(31) 同上註，頁 40-45。

(32) 白幡洋三郎認為，群櫻、群集、飲食是日本「花見」獨有的特色。參見：白幡洋三郎，《花見と桜——日本のなもの》再考》（東京：PHP 研究所，2004），頁 13-22。

單道路雖然經過整修，但一直到1910年左右，至竹子湖賞櫻仍被吟詠為「冒生命危險的賞櫻」（「命懸けの花見」），可以推想路況之險惡。⁽³³⁾ 儘管如此，在臺日本人依然絡繹不絕前往探勝，也舉辦「觀櫻會」。1903年左右開始，便可以在《臺灣日日新報》看到官方及民間諸多團體發起「觀櫻會」，如警務課、專賣局養氣俱樂部、愛國婦人會、法院、總督府等等。⁽³⁴⁾ 多為職場同僚或社交團體為單位的賞櫻活動。特殊的是，也曾由官民有志者發起「大觀櫻會」，不分親疏地號召愛櫻人士一同前往遊賞——透過報紙公告欲參加者自備食物、手巾，建議可於賞櫻時摘取櫻葉，歸宅後製作櫻餅，但不應以愛櫻花之名折花。⁽³⁵⁾ 這顯示身處異地，在臺日人之間存在著一種同為「內地人」的連帶關係，櫻花也繫起了所有離鄉者，召喚著共有文化的情感。

不過，從報導也能窺見，參加者多半是總督府的官僚、警察課的課員、新聞記者、紳士階級等等。也就是說，此時前往竹子湖賞櫻的主要為文人、官員，尚未普及一般大眾的生活。這除了與交通不便，不易抵達有關，費用高昂也是原因。以1904年為例，草鞋一雙1錢5厘，臺北到士林的鐵道車資則需11錢。⁽³⁶⁾ 因此，面對路險難至的客觀環境，仍毅然向山行觀櫻的舉動背後，實潛藏了「即使在外地也想見到櫻花」、「思慕故土的春天」的深刻懷鄉之情。向都市外緣「非日常」的移動，覓得的郊野櫻花，是身處「外地」的在臺日人得以追懷想像「內地」風景的空間。

三、統治者的植櫻

(一)移植、記號、永住觀念

原生櫻花的發現，以及投向櫻樹的目光，關係著在臺日人創造山間櫻景的舉

(33) 〈花のしおり〉，《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2月22日，第3版。〈竹仔湖の櫻（上）〉，《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1月17日，第7版。〈日日小筆〉，《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3月25日，第1版。

(34) 〈草山の觀櫻〉，《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2月26日，第5版。〈竹仔湖觀櫻會〉，《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1月30日，第2版。〈竹仔湖之櫻樹〉，《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3月13日，第5版。〈竹湖櫻狩〉，《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2月3日，第5版。〈一昨日の櫻狩〉，《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2月16日，第5版。〈竹湖遊人〉，《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2月24日，第5版。

(35) 〈草山の觀櫻（再び）〉，《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2月7日，第5版。

(36) 〈竹仔湖の櫻（下）〉，《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1月19日，第5版。

動。殖民政府著手將日本內地櫻花移植到臺灣，最早是 1910 年。管轄草山的臺北廳在竹子湖試種「內地櫻」樹苗 10 株，生育結果良好，隔年便增植一千多株「內地櫻」，計畫企圖比擬「嵐山吉野」；移植的目的則聲稱是爲了「保存風致」。⁽³⁷⁾ 那麼所謂的「保存風致」所指爲何？事實上，1900 年左右，竹子湖的櫻花漸爲世人所知，簡單的道路修築後，遊客攀折花枝，甚或商人採伐櫻樹下山買賣的狀況也隨之發生；加以 1905 年左右發生森林火災，竹子湖部分櫻樹也受到連累，爲數大減。⁽³⁸⁾ 從這幾年櫻樹的變化趨勢可知，1911 年大量移植「內地櫻」的動機，是爲了保護、恢復竹子湖原來的風貌，所以出現了所謂「保存風致」的意圖。這樣的行動與邏輯可說承襲了之前所論述，日本人認爲櫻花是「日本固有的，必須加以保護」的想法。然而實際的規劃與執行，竹子湖的櫻花並非再以原始的風貌受到「保存」，而是添加日本的要素——不僅自「內地」移植來櫻苗，還在原本已存在的「母國風景」意象上，拓上「嵐山吉野」的印記。自此，母國的風景、母國的空間不再僅是藉由言論轉化、地標的對應投射，以及同爲櫻花的緋寒櫻來追懷想像，還更透過具體的栽植行動，實現風景的移植與空間的圈畫。

隨著臺北廳這次大規模的舉動，期待種植櫻花的呼聲也不分官民熱烈地出現在報章雜誌，支撐這些論述內容的觀念想法，基本上仍延續「櫻花＝母國風景」的構圖，並且進一步結合在臺日人在外地所面臨的問題持續延伸演化。1911 年《臺灣時報》3 月號的補白登載了一小段話：

我國民與櫻花有著無法分離的關係，就某種意義來說，我壯烈的國民性，來自櫻花的感化，無其力則不成。現聽聞本島移植櫻花之聲，改善殖民地風景，藉此使之如身在母國一般，對永住觀念的創造極其必要。唯移植之際，當盡可能以試植培養適合本島土地的原生種緋櫻爲先，次南投霧社櫻，末方爲內地櫻。⁽³⁹⁾

這段補白只在文末標示「愛櫻花片談」，不過對照《臺灣日日新報》同樣這幾

(37) 〈竹仔湖の櫻花 万朶の紅雲は茲一旬の後にあり〉，《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2 月 16 日，第 7 版。

〈竹仔湖櫻樹增植〉，《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2 月 24 日，第 7 版。

(38) 〈櫻手折るべからず〉，《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3 月 2 日，第 7 版。

(39) 〈櫻花の移植〉，《臺灣時報》，第 21 號，1911 年 3 月，頁 30。原文爲日文。

日前後關於竹子湖移植「內地櫻」的一連串報導，還有一篇〈臺灣的櫻〉(作者處括弧為「川上技師談」)。(40) 〈臺灣的櫻〉除了介紹臺灣櫻花的種類，以及讓人彷彿置身日本內地的霧社櫻風景外，最後一段談的是「櫻的移植」，內容與《臺灣時報》的補白完全相同。推測「川上技師」是總督府技師川上瀧彌。文中提及「壯烈的國民性」，這樣的觀念應該是來自江戶時期以來有名的淨琉璃《假名手本忠臣藏》，武士切腹與櫻花散落的象徵性連結。此外，新渡戶稻造於1900年出版的《武士道》引用本居宣長的和歌，確立了大和魂與櫻花的隱喻關係，認為櫻花象徵了體現於武士道的大和魂，而武士道並不限於武士，是為體現日本人全體之精魂。(41) 川上瀧彌所謂的國民性與櫻花感化的關聯，可以自這層意義理解，也反映了當時知識份子的想法。

但從川上這段話可以看到，國民性與櫻花的連結對象僅止於日本人，尚未將新附之民臺灣人納入考慮，鼓吹移植櫻花時，納入思考的對象也僅止於在臺日本人，希望能夠藉由「櫻花—內地風景」的移植，讓身處殖民地的日本人能彷彿身在「母國」。這與當時渡臺日本人的高流動率有關，大多數的來臺日人一開始並未有埋骨臺灣的打算，因此如何留住這些「母國人」是總督府殖民政策的一大課題。櫻花的移植便與這樣的背景結合，寄望透過移植櫻花改造殖民地風景，以培養來臺「內地人」永住的觀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川上瀧彌主張先移植臺灣北部山區普遍生長的緋櫻，以及南投山區特有的霧社櫻。可見就連這位植物學家的心目中，儘管臺灣原生的櫻花不若日本內地的理想，但只要是櫻花，都仍足以代表日本，「櫻花是日本特有的」構圖依然存在。也唯有在這樣的前提下，臺灣原生的櫻花創造出來的，才得以是「母國的風景」。而這樣的構圖以及「內地櫻」、「臺灣櫻」的位階之差，恐怕更是普遍存在當時「內地人」心中，刊載於《日日新報》的一首和歌寫道：「飢不擇食，竹仔湖的櫻紅也好，少少的也好」，(42) 正貼切地傳達了這種心理。

(40) 川上技師，〈臺灣の櫻〉，《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2月22日，第3版。

(41) 關於武士道的再製、櫻花與大和魂象徵的討論，參見大貫惠美子，《ねじ曲げられた桜》，頁187-194。

(42) 柴田圓治，〈和歌〉，《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6月3日，第1版。原文為「飢えたるは食を擇ばず竹仔湖の櫻紅きも少なきもよし」。

(二)場所的象徵性與理想風景

1923年4月，當時的東宮皇太子裕仁（1901-1989）到臺灣視察，離臺前兩天曾驅車前往北投、草山遊賞。⁽⁴³⁾同年11月臺北州知事高田富藏（1867-？）向州協議會提出大屯山造林計畫，隔年（1924）臺北州決議在大屯山植樹造林，「以永久紀念攝政宮的渡臺及草山清遊」。隨著裕仁的成婚（1924），這項造林計畫也被稱為「行啓暨御成婚紀念事業」。裕仁即位大典（1928）隔年（1929）起，又被當做「御大典紀念事業」的一環，以十年計畫的方式，至1934年止陸陸續續在大屯山造林植樹。⁽⁴⁴⁾高田知事在1923年11月的州協議會上對這項計畫說明如下：

東宮殿下之本島行啓誠為空前盛事，為本島住民的光榮永久不能忘，本州為紀念此一盛事以及來春將舉行的殿下結婚大典，讓後世子孫亦能長久沐浴行啓之餘澤並欽仰盛德，以親印御足跡的草山為中心，橫亙大屯山、七星山、及紗帽山一帶約一千兩百町步，進行造林，可以達成保護風致、涵養水源、保安國土等目的，同時也為將來多事的州財政培養根源，因而列出這筆經費計畫創造基本財兼紀念造林。⁽⁴⁵⁾

從總面積1,200甲的造林計畫和結果來看，其時栽植的樹種主要為松樹（包含臺灣赤松、琉球松、黑松）和相思樹。⁽⁴⁶⁾相思樹生長容易、快速，是當時主要的炭薪木材，也用以作為坑木、枕木等等；松樹雖成長不易，但仍具採伐的經濟價值。⁽⁴⁷⁾這兩個樹種的選擇可能具有經濟方面的考量，正如高田知事所說，為州財政培養根源。而觀賞木僅佔21甲，包含楓樹及櫻樹等等。儘管櫻花並非這次造林的主角，其數量仍相當可觀。單單1925年，櫻花就栽植了3,000株，而整個大屯山造林的十年中栽種的櫻樹共達四萬多株，其中以緋寒櫻（16,827株）、染井吉野

(43) 時為4月25日。〈東宮殿下の臺灣行啟〉，《臺灣時報》，第46號（1923年5-6月），頁48-50。

(44) 佐藤正藏編，《大屯山彙と温泉》（臺北：臺灣產業評論社，1937），頁9-12。

(45) 藤原仁一，〈大屯山造林私見〉，《臺灣山林會報》15（1925年9月），頁7。原文為日文。

(46) 計畫中的植樹面積為臺灣赤松280甲、琉球松360甲、黑松276甲、相思樹150甲。完成後的結果，臺灣赤松199甲、琉球松202甲、黑松436甲、相思樹129甲。以上數據依據同上註，頁9。臺灣山林會，〈大屯山一帶の記念造林完成〉，《臺灣の山林》98（1934年6月），頁46。

(47) 藤原仁一，〈大屯山造林私見〉，頁7。

(9,121 株)、大島櫻 (8,796 株) 爲大宗。栽植地則限於草山、竹子湖、十八分附近以及面天山方面，因此可以說是相當密集。⁽⁴⁸⁾ 若林正文考察 1923 年東宮行啓指出，皇太子的臺灣視察具有「權威的捺印」機能。⁽⁴⁹⁾ 前引造林企劃者高田知事又希冀藉著植樹這種地表風貌的永久性改變，⁽⁵⁰⁾ 讓後世子孫「長久沐浴行啓之餘澤並欽仰盛德」。在這層象徵意義上，具天皇之「身」的皇太子足跡踩印過的土地種植象徵日本的櫻花，舉動和景觀皆足以讓當時人感受到「帝國的延長」，櫻花的栽植遂成爲內地延長主義「權威的捺印」另一種形式的展現。另外，松樹的栽植除了上述緩慢的經濟效益外，恐怕更因爲它也是日本代表性的風景。⁽⁵¹⁾

選擇以植樹爲紀念事業，除了植樹被認爲是可「永久的」之外，還牽涉當時對森林的看法與認識。1924 年臺灣總督府植產局林務課出版的《苗圃及造林實行法》收錄了農商務省山林局編的〈紀念植樹〉一文。該文一開始便以極長的篇幅論述森林的諸多效用，說明植樹適於作爲紀念事業的理由，是因爲具備水土保持、氣候調和、水源涵養、風致衛生等必要性。⁽⁵²⁾ 從前引高田知事的說明文可以得知，同爲紀念事業的大屯山造林也在這樣的思想潮流中實踐。然而樹種選擇的標準卻以「本邦固有的樹種、能適應地方風土、對風雪、病蟲害等抵抗力強、姿勢雄壯富風致、長年不入衰境、有價值」等爲條件。⁽⁵³⁾ 從這些條件看來，樹種是否能達到「森林的效用」其實受到忽視，足以代表日本的、永久的、美觀的才是實質的

(48) 〈大屯山麓に三千餘本の櫻を〉，《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4 月 12 日，第 9 版。大橋準一郎，〈大屯國立公園と櫻栽植〉，收於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編，《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大屯國立公園內櫻栽植報告》（臺北：大屯國立公園協會，1943），頁 46。

(49) 由日本本國而來的政治圖騰承認日本人在此地的作爲，同時，臺灣人在日本人的示範下學習臣民儀禮，邁向「帝國的忠良臣民」——前者的「征服儀禮」與後者的「通過儀禮」結合，展開了內地延長主義「權威的捺印」，在象徵意義上臺灣成爲天皇制空間中的「地方」。參見若林正文，〈1923 年の東宮行啓——天皇制の儀式戰略と日本植民地主義〉，收於平野健一郎編，《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文化の交流と摩擦》（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1984），頁 195-234。

(50) 藤原仁一，〈大屯山造林私見〉，頁 8。

(51) 例如，志賀重昂在《日本風景論》中主張「日本松國說」，認爲日本所到之處皆有的松柏科植物，足以涵養日本國民的氣象，隆冬不凋，潔操雋邁；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東京：政教社，1894），頁 9-12。松的意象參照齋藤正二，《植物と日本文化》，頁 9。伊藤銀月的《日本風景新論》中，日本是櫻花國，也是松國，程度雖稍遜，但也是梅國。伊藤銀月，《日本風景新論》（東京：前川文榮閣，1910），頁 2-28、257-263；佐藤俊樹，《桜が創った「日本」》，頁 123。

(52) 農商務省山林局編，〈紀念植樹〉，收於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林務課編，《苗圃及造林實行法·附錄》（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林務課，1924），頁 1-4。

(53) 同上註，頁 5。

考慮。事實上，日本內地櫻花移植臺灣，經驗上往往遭遇病蟲害，不數年即枯死，⁽⁵⁴⁾無法達到「能適應地方風土、對風雪、病蟲害等抵抗力強、長年不入衰境」的目標，但是「本邦固有的樹種」這一點，對日人來說，櫻則是首選。

另外，關於紀念事業植樹的報導，總會以「大屯山將來可望成爲北部壯觀的一大遊園地」之類的語句爲文章結尾。實則皇太子行啓前的 1922 年已有將草山規劃爲一大遊園地的計畫，然初始的計畫只有遊覽道路等設施，並無造林。⁽⁵⁵⁾這麼看來，大屯山植樹名義上是爲了紀念皇太子到過此地，但其附加價值，甚或最終目標則是成爲一處大眾可以前往遊賞的名勝。那麼，什麼樣的地方能夠吸引大眾前往？這便取決於日本人心何種風景可以成爲勝地了。當時人流行一種說法：櫻千株，松千株，便可以成爲名勝。⁽⁵⁶⁾這個說法倒讓我們窺見樹種選取的另一重標準。要使大屯山成爲吸引大家前往的壯觀遊園地，櫻花會是風景中不可或缺的要角——日本人正以這樣的價值觀在大屯山一步步布置出心目中的理想風景。

(三)川流郊野

統治當局兩次大規模栽植櫻花使得竹子湖廣爲人知，無論以臺灣居民或日本內地爲對象的書籍都有相關介紹，竹子湖無疑成爲「櫻的名所」、「櫻花勝地」。⁽⁵⁷⁾此外，交通與設施等外在環境的改善也使賞櫻性質轉變。1911 年「內地櫻」首次移植竹子湖時，也同時整修了通往竹子湖的山路。鋪蓋碎石子，沿途設立路標，並在竹子湖派出所旁新建兩座涼亭讓遊人歇腳，每至花季，前往遊賞者絡繹不絕。⁽⁵⁸⁾1913 年左右臺北—北投、1925 年左右臺北—草山的巴士開始運行，⁽⁵⁹⁾巴士的運行不但讓行程往返更爲輕鬆容易，其重大意義更在於，使得郊區納入臺北

(54) 〈紅雲漢々 桃は七分綻ぶ 櫻は年々枯死〉，《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 2 月 1 日，第 7 版。

(55) 藤原仁一，〈大屯山造林私見〉，頁 7。

(56) 大橋準一郎在櫻委員會的會議中曾談到，「自古以來，櫻千株，松千株，便可以成爲名勝」。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編，《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大屯國立公園內櫻植栽報告》，頁 24。

(57) 杉山靖憲編著，《臺灣名所舊蹟誌》（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頁 536。臺北市役所編，《臺北市案內》（臺北：臺北市役所，1926），頁 19-20。臺北市役所編，《臺北市案內》（臺北：臺北市役所，1928），頁 27。仲摩照久編，《日本地理風俗大系第十五卷（臺灣編）》（東京：新光社，1931），頁 236-237。

(58) 〈竹仔湖の櫻花〉，《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2 月 16 日，第 7 版。杉山靖憲編著，《臺灣名所舊蹟誌》，頁 536。

(59) 〈乘合自動車開業〉，《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1 月 3 日，第 5 版。〈北投行の増加〉，《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6 月 30 日，第 5 版。〈草山の乗合〉，《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6 月 10 日，第 2 版。

市民的「一日生活圈」，原本侷限於文人、中產階級以上的活動，遂得以擴及一般大眾。如此，作為「內地」風景移植、栽種的櫻花，逐步走入民眾的生活，不僅串起都市郊野間的流動，也讓人們得以在殖民都市的外緣享受「內地風景」。

1923年爲了皇太子行啓，修築草山汽車道。翌年開始，亦爲行啓紀念及御大典紀念事業的一環，與造林計畫、櫻花栽植並行的尚有：興築草山大眾公共浴場眾樂園、設立竹子湖休憩所、整修士林一草山及北投一草山間的道路爲汽車遊覽道路，其後更鋪設草山至竹子湖之間的车道，並延長至菜公坑山。⁽⁶⁰⁾十年間，這些設施與道路的整備讓草山不再是偏遠之地。1935年的一篇報導可以感受到這時期賞櫻的狀況與氣氛：

去年臺北州開鑿草山至竹子湖的道路，不但女子幼童皆可輕鬆登山，一般大眾也可利用臺北州經營的竹子山莊溫泉。此外，今年竹子湖農業組合亦新設小賣店，其他的賣店販售茶、奶糖類、罐頭類、菸草等等，食物則有甘藷湯、炒米粉等等，這對一日清遊是再適合不過了。⁽⁶¹⁾

伴隨上述大量櫻花的栽植、交通的整備、設施的興建，以及小店的出現等等外在條件的變化，賞櫻開始具有類似日本內地群櫻、飲食、群集的元素。不同的是，比起日本內地，這裡更具「休閒、保養」的氣氛。草山在1913年設置公共浴場以後，前往溫泉地休閒保養的人就不少。1923年皇太子行啓後，隨著附近的設備、旅館、別莊日益完善，旅客更是逐年增加。竹子湖的櫻花即名列溫泉地附近的勝景之一。⁽⁶²⁾從草山溫泉至竹子湖，徒步約一小時可達，也可租車前往，⁽⁶³⁾可以推想入山賞櫻的遊客會連帶泡泡溫泉再踏上歸程，或者在溫泉地過夜的旅客也會前往竹子湖賞櫻。行啓紀念與御大典紀念事業企圖將草山規劃成「一大遊園地」之後的幾年，設立國家公園的呼聲漸起。1928年開始，幾經調查，1935年底正式將

(60) 佐藤正藏，《大屯山衆と温泉》，頁9-10。

(61) 〈竹仔湖の櫻 日曜日ごろが見頃 道はよし、賣店もある〉，《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2月28日，第11版。

(62)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臺灣鐵道旅行案内》（臺北：臺灣總督府鐵道部，1924），頁207-208。中島春輔，《臺北近郊の北投草山温泉案内》（臺北：臺灣案内社，1930），頁62、171。

(63) 臺北州編，《臺北州公共浴場衆衆園案内》（臺北：臺北州，不著編年）。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臺灣鐵道旅行案内》（臺北：東亞旅行社臺灣支部，1942），頁155。

大屯山系劃定為國家公園。⁽⁶⁴⁾ 國家公園預定地大屯山整體的建設讓此處的賞櫻不單只為賞櫻而賞櫻，而與整個旅遊休閒活動融為一體。

除了硬體設備、園區規劃及交通環境等條件改變產生的性質轉換，賞櫻也與 1920 年代逐漸興起的登山、遠足 (hiking) 等戶外活動結合。1910 年代以前的登山多是為了探險與調查，之後大眾化的休閒登山逐漸風行，1926 年「臺灣登山會」成立。到了 1930 年代，正式的運動型登山活動之外，娛樂性的登山及郊遊遠足的愛好者愈形增多。⁽⁶⁵⁾ 1937 年一本介紹「一日遊」行程的遠足健行手冊中，無論「菜公坑山路線」、「七星山路線」或「大屯山路線」，竹子湖都是必經之地。⁽⁶⁶⁾ 這顯示賞櫻有時候是在登山活動中實踐。甚至進一步也發展出專為賞櫻設計的遠足路線，例如 1937 年《臺灣日日新報》企劃部主辦的賞櫻遠足活動。其行程與當日狀況如下：參加者一百五十餘人，3 月 14 日早上 8 點由臺北出發，分乘草山巴士 7 輛前往竹子湖，眺望竹子山莊附近的櫻花。途經大屯鞍部、菜公坑山腹而下，抵北新庄公學校，在公學校園櫻花盛開的樹下午餐。下午兩點再出發前往水梘頭公學校賞櫻，在淡水公會堂稍歇後，4 點 50 分淡水車站解散。⁽⁶⁷⁾ 這整個活動的行程透露出的交通條件已和 1920 年代以前大不相同，足以支撐長距離及多景點的一日來回移動；同時，也反映賞櫻活動與遠足健行結合的一個面向。

四、民間的植櫻與城市生活

(一) 庭院、料亭、市場

櫻的存在並不只於山林郊野，也不僅限於官方的移植，領臺初年，民間的日

(64) 關於國家公園的設立，參見曾山毅，《殖民地台灣とツーリズム》（東京：青弓社，2003），頁 256-258。敘述了其過程及經緯。

(65) 關於登山活動的興起，參見同上註，頁 251-256。

(66) 臺灣日日新報社企畫部編纂，《臺日ハイキングコース（臺北近郊篇）》（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企畫部，1937），頁 8-10。1942 年由臺北市役所出版的《臺北》也介紹了相同的登山健行路線。參見臺北市役所編，《臺北》（臺北：臺北市役所，1942），頁 10。此外，《國家公園寫真》中介紹的遊覽、健行路線也包含了竹子湖。參見臺灣國立公園協會編，《國立公園寫真》（臺北：臺灣國立公園協會，1939），頁 4。

(67) 順帶一提，參加費用大人 80 錢，小孩 60 錢。〈櫻花をたづね 風流ハイク〉，《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3 月 11 日，第 7 版。〈櫻の花を訪ねて お爺さんお婆さんも加はり きのふ本社主催ハイク〉，《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3 月 15 日，第 7 版。

本人也經常自日本內地移植櫻樹至居所庭院。1910年的一篇報導可以窺見早期城市櫻花的蹤影。

目下臺北所植內地櫻。約有六七分盛。如新起橫街丸中。勅使街道梅屋敷。新起街木下氏庭園。府中街村田氏庭園。皆盛為栽植。其他各處亦有數十本。皆為吉野種、嵐山種、彼岸櫻、鬱金櫻、枝垂櫻等。其色皆似紅梅。無淡紅□。中有緋櫻一種。其瓣年年漸小。參閱本欄寫真可知其概。又村田氏庭園□櫻□□七八年前移植□年年開放。猶為幸事也。⁽⁶⁸⁾

可見當時栽植櫻花的多是文人雅士，以及料亭（高級日本料理屋）的庭園。⁽⁶⁹⁾文中的木下氏即是曾任臺灣日日新報主筆，後為實業家的木下新三郎。⁽⁷⁰⁾1907年春，木下庭園中栽植的三株櫻樹開花時，還曾開宴設席邀請如尾崎秀真、黃植亭、⁽⁷¹⁾謝雪漁、⁽⁷²⁾羅秀惠⁽⁷³⁾等多位漢詩人前往賞花賦詩。⁽⁷⁴⁾與日人有往來的臺

(68) 〈臺北櫻花〉，《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1月30日，第7版。□為模糊無法判讀的文字。

(69) 都市以外，其他像是北投或草山的私人別墅，也能看到民間日本人移植櫻花的情形。中島春輔，《臺北近郊の北投草山溫泉案内》，頁66。

(70) 木下新三郎（1863-？），號大東。1896年自民政局秘書課長退職東歸；1897年受《臺灣新報》聘任主筆渡臺任職，玉山吟社成員；1900年時仍任合併改題後之《臺灣日日新報》主筆；1907年離開報社創立臺灣建物會社，居艋舺新起街一丁目。參見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收於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2000），頁175；大園市藏編纂，《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1916），頁322。另外，文中的村田推測為村田義教（1861-？），曾任陸軍通譯官，後經營日本瓦製造業，居府中街一丁目十二番地。大園市藏編纂，《臺灣人物誌》，頁18。

(71) 黃茂清（生卒年不詳），號植亭，生員，能官話、英語，1896年大加蚋堡務署書記，縣雇員兼艋舺街長，1897年國語傳習所教師，獲紳章，詩作甚多。1898年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編輯。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頁119。

(72) 謝汝銓（1871-1953），字雪漁，號奎府樓主，晚署奎府樓老人。原籍臺南，日治以後，遷居臺北。清時曾舉秀才，後入總督府國語學校。1905年進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工作，並曾任《風月報》主筆。1909年與洪以南等倡設瀛社，成為北臺第一大詩社。參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灣歷史辭典》，線上版，<http://taipedia.cca.gov.tw/taipedia/dict/DispText.aspx?id=4414&CurrPage=1&menu=0&n=0&key=%e8%ac%9d%e6%b1%9d%e9%8a%93&type=1>；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說——植民地とメディア〉（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論文，2004），頁67。

(73) 羅秀惠（1865-1942），字蔚村，號蕉麓，別號花花世界生，臺南人。清光緒年間舉鄉試。1900年赴北參加「揚文會」，任幹事，《臺澎日報》漢文部主筆，後任南師漢文教諭。曾受總督府授佩紳章。1908年又赴北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筆正。國家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辭典》，線上版，http://www2.nmtl.gov.tw:8090/ug-9.jsp?xsd_name=entry&handle=2702；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灣歷史辭典》，線上版，<http://taipedia.cca.gov.tw/taipedia/dict/DispText.aspx?id=4530&CurrPage=1&menu=0&n=0&key=%e7%be%85%e7%a7%80%e6%83%a0&type=1>。

(74) 黃植亭，〈木下大東先生家植櫻花三樹時方盛開設筵邀賞詩以紀之〉，《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4月9

灣漢詩詩人也有機會在這樣的場合應邀前往，這也成為臺灣傳統文人形塑櫻花印象的途徑之一（詳細的討論見後）。日本上流社會和文人雅士原本就有欣賞單株名櫻的傳統，植有「內地櫻」的庭園移植的不單單只是櫻花，還是一種日本式的情調，為詩人們的吟詩交遊創造出風雅的空間。

基於類似的因素，一些高級的日本料理屋（料亭）也從日本內地移植櫻樹，以營造宴會、茶會的氣氛，引文中的「梅屋敷」、⁽⁷⁵⁾「丸中」都是當時高級的日本料理屋。只是，氣候差異使得移植的櫻花到了隔年往往無法開花或枯死。因此，以丸中為例，每年春天都重新移植一兩百株的櫻花。許多茶會都在滿開的櫻樹下舉行，丸中也會配合櫻花季，規劃歌謠表演，以招攬家族的遊覽及宴會的顧客。⁽⁷⁶⁾此外，一些咖啡座也以櫻花滿開當做招徠顧客的廣告。⁽⁷⁷⁾城市中私人庭院及料理屋的櫻花為文人雅士及上流社會營造出饒富日式趣味的空間，讓他們即使身在外地也能享受「內地式」的風雅。

相對於文人騷客的雅興，一種類似日本內地大眾化的賞櫻風景也曾出現於城市一隅。1913年到1915年，新起街市場（今紅樓劇場）一家年糕紅豆湯專賣店（關口しるこ）為了吸引顧客，年年自日本內地移植櫻花。1913年吉野櫻60株，1914年彼岸櫻100株，1915年更移植130株。⁽⁷⁸⁾如此一來，人們不用千里迢迢奔赴山地，在都市便可享受一邊賞花一邊飲食作樂的趣味。這項舉動讓「內地式」的賞

日，第1版。蕉麓，〈大東先生招赴觀櫻會識詩以謝之〉，《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4月10日，第1版。尾崎白水，〈大東先生招赴觀櫻會植亭黃君詩先成因次韻賦四絕句〉，《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4月11日，第1版。謝雪漁，〈大東先生寓齋櫻花盛開治杯招賞賦此以謝〉，《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4月13日，第1版。蔡珮香，〈步黃君植亭赴大東先生邀觀櫻會瑤韻〉，《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4月18日，第1版。

(75) 「梅屋敷」是當時業界最繁昌的料亭，前身為府後街（今館前路）的「吾妻」，1900年轉移到敕使街道（中山北路）上並更名為「梅屋敷」，現為「國父史蹟紀念館」。參見又吉盛清，《台灣 近い昔の旅》（東京：凱風社，1996），頁26。

(76) 至少到1916年都可以看到丸中移植內地櫻的報導。〈丸中の櫻花〉，《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3月28日，第7版；1914年3月27日，第7版。〈花見の茶事〉，《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4月3日，第9版。〈丸中の內地櫻〉，《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4月9日，第7版。

(77) 〈本日より櫻満開〉，《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3月7日，第2版。

(78) 〈內地櫻移植〉，《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3月18日，第7版。〈新起街市場の櫻〉，《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3月21日，第7版。〈關口の內地櫻移植〉，《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3月1日，第7版。〈關口の花見汁粉〉，《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3月20日，第7版。〈市場櫻花盛開〉，《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3月28日，第6版。〈關口の內地櫻満開〉，《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3月27日，第7版。

櫻文化也能在「日常的」「外地生活」中實現，並在城市中也創造出一幅「非日常」的「內地風景」。

(二)吉原遊廓的面影

約當臺北廳在竹子湖移植一千多株「內地櫻」，企圖比擬「嵐山吉野」的同時，1911年1月艋舺的妓樓團體（貸座敷組合）在新年會上也決議通過多年來的夙願，將300株櫻樹種植於淡水河畔，這一計畫並在3月付諸實行。⁽⁷⁹⁾ 這個看似意料之外的地點，其構想有日本傳統遊廓意象的淵源。1912年當樓主們再次商議是否移植櫻樹時便提到「今年想更進一步在歡慈市街大道兩旁植櫻，讓人思及江戶的吉原仲之町」。⁽⁸⁰⁾

吉原是江戶幕府官方認可的遊廓，一年中最重要的人事之一便是陰曆2月25日在吉原最繁華的大道仲之町種植櫻樹。植櫻樹的由來則源於傳統的歌舞伎，起初用以隱喻浮世的虛幻與華麗。⁽⁸¹⁾ 吉原遊廓的櫻花、浮生若夢的華美、藝者的官能性等意象經常透過歌舞伎、浮世繪、人形淨琉璃傳達，成為日本人對遊廓共有的想像。最能表現藝者世界感官性視覺藝術的，莫若〈仲之町的夜櫻〉——夜空之下白色櫻花的神秘美，不但是浮世繪畫師喜愛的主題，也經常成為歌舞伎表演的舞臺佈景。⁽⁸²⁾

1911年、1912年經由艋舺遊廓樓主們的商議，吉原遊廓的意象也出現於殖民地臺灣。1911年淡水河畔植櫻，附近的青樓也懸燈掛彩，在樹梢懸吊燈籠。1912年從歡慈市（今貴陽街二段）到大溪口岸（今淡水河第一水門附近）兩岸種植內地購入的吉野櫻，並於樹枝上點燈。三月底花開時每晚賞花遊人紛至，甚至還有攜家帶眷往遊的情景。⁽⁸³⁾ 此處種植櫻花的初衷是為了攬客，遊廓並非適合女人小

(79) 〈艋舺の櫻〉，《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月21日，第7版。〈新評林 栽櫻樹〉，《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3月13日，第2版。〈雜報 艋舺河畔櫻樹〉，《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3月13日，第3版。

(80) 〈花柳界 仲の町不成立〉，《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2月13日，第7版。

(81) 吉原植櫻成為年中行事大約是1741年到1749年之間。每年花期結束後的4、5月便移除櫻樹，植樹、移樹象徵吉原的藝者12歲開始從業，28歲退出。參見瀧川政次郎，《吉原の四季：清元「北州千歲壽」考証》（東京：青蛙房，1971），頁141-143。

(82) 大貫惠美子，《ねじ曲げられた桜》，頁92-98。

(83) 〈艋舺櫻樹移植〉，《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3月17日，第5版。〈艋舺の櫻と人出〉，《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3月25日，第5版。〈花柳界 豈計らんや〉，《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3月29日，第7版。

孩的遊樂場所，但「外地」小島難得一見櫻花滿開的風景，卻使得男女老少盡皆前往觀賞，造成殖民都市中短暫的「內地風景」。櫻花散落後，原先的計畫是移往竹子湖，然因考慮路遙崎嶇前往觀賞不易，幾經議論之後，移植至婦幼也容易前往的北投及圓山公園。⁽⁸⁴⁾順帶一提，艋舺遊廓移植櫻花，儘管短時間招來不少顧客，但因移植成本過高，只是一時好景氣的假象，故並未持續。

從上述的現象可以發現，民間方面的移植除了私人的庭園之外，多半是一種商業上的手法，藉以招攬客人。但無論是私人庭園的賞櫻吟詩，或是料亭市場櫻樹下飲酒作樂、遊廓的視覺意象，都有江戶時代以來的傳統淵源。這些民間人的「內地櫻」移植，非只在「外地」的殖民都市創造了一種「內地空間」，也等同移植了內地式的生活情境與色調。艋舺遊廓的櫻花讓在臺日人聯想江戶時代的吉原遊廓，竹子湖則比擬吉野山。不管是民間或官方，臺灣的風景在離鄉的日人腦海中不斷與日本內地的風景交織重疊，在新領土以象徵「內地」風物的櫻花簽畫日本「內地」的記號。

五、臺灣人與櫻花

早期紀行文中在臺日人經常對樵夫斧刃下的櫻花投以無限憐惜，在日人眼中，臺灣人不懂得欣賞櫻花，也不特別愛惜，並稱櫻花為「山櫻桃」或「櫻桃」。⁽⁸⁵⁾清代臺灣的詩歌中的確不見詠嘆櫻花或櫻桃的詩句，清代方志中也沒有關於臺灣產櫻或櫻桃的記載。臺灣文獻叢刊諸書提及櫻花的詩作幾乎都是日治時代之作，且多半出現在至日本遊賞或送學子負笈東游的情境。非日人編修的方志方面，連橫 1920 年刊行的《臺灣通史》虞衡志始有「櫻：淡水竹仔湖及埔裏社內山，野生頗多」的記載。⁽⁸⁶⁾從這些傾向來看，日治時期臺灣人對櫻花的觀感與印象，相當受到在臺日人的影響。那麼，這些印象與觀感具體為何，又經由怎樣的路徑影響

(84) 〈艋舺の櫻處分〉，《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4 月 8 日，第 5 版。〈圓山北投の櫻〉，《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5 月 28 日，第 7 版。

(85) 〈櫻の述懐〉，《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3 月 3 日，第 7 版。杉山靖憲編著，《臺灣名所舊蹟誌》，頁 536。〈內地號／内地に無き臺灣の櫻〉，《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2 月 20 日，第 4 版。

(86)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以下簡稱文叢〕，1962），虞衡志，〈花之屬〉，28: 700。

著臺灣人呢？

臺灣人與日本人的接觸、私交是情報與印象形成的可能通路。例如早期當日人至山中訪櫻時，會以紙筆或臺語告訴附近住民，「此花是天下名葩。勿伐勿折。謹護之以爲此土之寶」。得知日人愛櫻，也有臺人從事買賣；又或地方官在離臺時將官舍所植櫻樹轉贈給當地有私交的士紳。⁽⁸⁷⁾ 這些往來也許範圍狹隘，卻是互動最直接的管道。

另外，傳統文人與日本漢詩人的交遊往來，對櫻花印象的形塑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07年木下新三郎庭院中的櫻花盛開時曾開宴設席邀黃植亭、謝雪漁、羅秀惠等人前往遊賞賦詩。當時黃植亭的詩作如下：

三樹櫻花半畝園。玉爲姿色月爲痕。生來氣節同開落。好是東邦武士魂。

〔按：第二首略〕

葉製甜點葢作茶。清真氣味勝蘭葩。香州絢爛堆成錦。栽入城西處士家。
名跨群芳最上頭。似將解語說風流。極東天地櫻花國。散片飛揚五大洲。⁽⁸⁸⁾

宴中還品嚐搭配櫻花季的和式甜點櫻餅和櫻茶。對櫻花的印象、比喻，無論是「東邦武士魂」或是「群芳最上頭」，都與當時日人對櫻花的評價相符，可以推想這些說法是吸收自與日人的言談，或報章雜誌。最末一首詩，「極東天地櫻花國。散片飛揚五大洲」一聯，更受日俄戰爭後，日人於新領地種植櫻花和鼓吹櫻花移植言論的影響。當時有篇題爲〈櫻花同盟（百年後的櫻花國民）〉的文章恰好反映出日俄戰後這類言論風潮。認爲櫻花是日本人的性命，隨著海外拓展，有力說櫻花之美的必要。文中可以看到從鎖國到開國，最後晉身帝國之列的日本希望讓世界認識的潛在慾望。⁽⁸⁹⁾ 這篇文章重要的主張是，希望「日本人移植之處，櫻花伴之」，

(87) 中村櫻溪，〈(詞林) 竹仔湖觀櫻花記〉。鶯の家，〈櫻の述懷〉。〈十把一束〉，《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3月5日，第5版；〈甘棠遺愛〉，《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1月17日，第6版。

(88) 黃植亭，〈木下大東先生家植櫻花三樹時方盛開設筵邀賞詩以紀之〉。

(89) 例如文中提到「想ふに日本は既に孤住屏居の陋を脱したると同じく櫻花も亦世界的の花たらざるべからず、日本人にして果たして海外發展的の人種たるを拒むべからずとせば、日本人の性命たる櫻花も亦た世界に其の美を争ふの名花たらざるを得んや。」羅秀惠譯爲「日本既同脫屏居之陋。而櫻花亦世界不可少之花。是日本人果海外發展之人種。所不容拒。日本人之性命之櫻花。亦世界最美之名花。」

千百年後，隨處有櫻花，成就「櫻花同盟」。其漢文版正是由參加這次觀櫻會的羅秀惠所譯。⁽⁹⁰⁾ 我們可以從前引黃植亭的詩窺見「櫻花同盟」論述的縮影。此外，木下的觀櫻宴上謝雪漁也寫了：⁽⁹¹⁾

兩株櫻樹小園中。移植新從大海東。得意時來自開發。不須搥鼓效唐宮。
開落偏同武士魂。眾香國裡合爲尊。兩千五百餘年日。花亦猶人氣節存。

謝雪漁的第一首詩也認為櫻花是日本獨有的，第二首詩的論調與黃植亭之詩相似，可見櫻花對應武士的比喻，甚至認為櫻花是兩千五百年前（傳說中）桓武天皇即位至今那麼久遠的，亦即與日本歷史共長久的。如此對櫻花的描寫儘是日本的身影，也包含櫻花對應日本的獨特性，以及櫻花在日本歷史中的恆久性。

從黃植亭、羅秀惠、謝雪漁的身世背景來看，三人都是在清代接受傳統漢學教育、應科舉，進入日本統治後，接受新式教育，力學統治者語言，甚至受紳章的傳統士人，可以說是新統治者意欲拉攏，同時也被認為與統治者合作色彩濃厚的「御用記者」。但是，亦不應忽視，這些發表於第一官報《臺灣日日新報》上的言論，必須是符合統治當局思維框架的，至少是不能違逆的。然而另一方面，漢文欄本身承擔教化、善導「風氣未開、民智閉鎖」的臺灣人之責，任職臺日漢文欄的記者們也深自意識到己身肩負傳播「文明」的使命。⁽⁹²⁾ 因此依照日人的圖像描繪櫻花輪廓的言論、品評，雖然看似為當時日人言論的複述，卻也是傳統士人面對新政治環境和世界情勢的一種認識和態度。黃植亭在謝詩後面的漫評寫到「蓬島名葩。以櫻花為第一。雖無典故可襲。而寫之以意。傳之以地。自覺精神百倍。」事實上，關於櫻花既非日本獨有，也非無典故可尋。正如領臺初期日人說臺灣人稱櫻花為山櫻桃一般，清代的花譜就有關於櫻桃、櫻桃花的記載，詠物詩中也能

(90) 〈櫻花同盟（百年後の櫻花国民）〉，《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4月3日，第1版。蕉麓譯，〈櫻花種界〉，《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4月6日，第3版。

(91) 謝雪漁，〈大東先生寓齋櫻花盛開治杯招賞賦此以謝〉。

(92) 關於《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欄所扮演的溝通角色，漢文欄與臺灣人記者之間是一種協力、非批判的關係，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說〉，頁58-72有詳細的考察與論述。另外，黃美娥也以魏清德為例，提及他應聘臺灣日日新報時戰戰兢兢的心情，並討論了他透過媒體建構出一種新與舊交融的文明啟蒙論述。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頁183-235。

看到櫻桃、櫻桃花，甚至櫻花。⁽⁹³⁾ 只是提及櫻花的詩作多以寫景為旨，且相較於其他花種數量的確不多。臺灣平地上既然見不著櫻花芳蹤，便也沒有機會入詩。臺灣割讓給日本後，櫻花意象的空缺很快就由日本人帶進來的論述填補，而上述與日人交遊的臺灣人又多任職報社，櫻花和日本之間的聯結符號，其種種圖像遂又經由這些臺灣人之筆再次複製與傳播。

也許我們會懷疑，櫻花與日本連結的意象是否僅存在於像黃植亭、謝雪漁這批任職於臺灣日日新報，形塑、傳播櫻花意象的漢詩人。然而從隱居不仕的王松⁽⁹⁴⁾身上，可以擷取到更純粹而普遍的認識，同時發現報章言論影響滲透的軌跡。1905年付梓的《臺陽詩話》中他寫到，

支那以牡丹為花王，西洋以薔薇為花王，日本則以櫻花為花王。花王之於民族，其關係如何，余不詳論。……蓋櫻花澹麗清妍，自與牡丹、薔薇異其撰。牡丹、薔薇，諸國多有之；櫻花惟日本最盛，他國則罕見也。吾臺獨北部竹仔湖有此種，天然生植，不費人力栽培；相傳二百年前，延平王由日本移來，理或有之。花時，一片如雪，氣韻殊清。⁽⁹⁵⁾

這段日治初年的文字可以窺見王松腦海中的櫻花圖像和認知——對日本人而言，櫻是花中之王，日本是櫻花之國，這樣的圖像也是當時臺灣文人共有的認識。後段提及的「延平王由日本移來」之傳說，顯見來自前述中村櫻溪 1902 年〈竹仔湖觀櫻記〉的論述。可以說是當時日人的言論透過報紙影響臺灣人的例證，臺灣人對櫻花的認識與觀感也經由報紙的傳播路徑進而建立。

不過，懷抱抗日意識與反殖民色彩的新興知識份子，對於櫻花則建構出一番不同的論述。企圖喚起臺灣人的輿論，與御用的《臺灣日日新報》處於對立關係

(93) 王灝等編，《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花譜》（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櫻桃花〉，28:6下-12上。張玉書、汪霏等編，《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櫻桃類〉，卷312。兩者皆有收錄歷代詩詞。

(94) 王松（1866-1924），字友竹，號寄生，別號滄海遺民，新竹人。乙未割臺，攜眷返泉州，後臺局稍定，東渡回竹。國家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辭典》，線上版，http://www2.nmtl.gov.tw:8090/ug-9.jsp?xsd_name=entry&handle=1482；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灣歷史辭典》，線上版，<http://taipedia.cca.gov.tw/taipedia/dict/DispText.aspx?id=540&CurrPage=1&menu=0&n=0&key=%e7%8e%8b%e6%9d%be&type=1>。

(95) 王松，《臺陽詩話》（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5），下：22下。

上⁽⁹⁶⁾的《臺灣民報》，筆者僅找到一篇與櫻花有關的報導，內容與東京櫻花相關：

日本櫻花、中外著聞……本月中旬東都上中下各階級、皆扶老攜幼、三五成群、或歌舞於風前、或酣醉於花下、除上野公園之花客、較為優雅的散策玩賞而外。若至近郊、飛鳥山、荒川、小金井等處，則幾乎成為店員及男女職工等階級之亂舞狂踏之地。男扮女裝、放歌唱飲、奇態百出、令人絕倒、其中甚至有以戲打而至鮮血淋漓者、日以數千計。似此對於櫻花之特別感興、苟非櫻花國人、實難以心驗其真趣味也。⁽⁹⁷⁾

這段賞櫻情景的描寫，不但看不到對櫻花的稱揚比喻，也不見優雅的吟賞風景，而是全然從一種事不關己的旁觀者之眼去描繪一幅驚心的景象——櫻樹下的痴狂亂醉。可以窺見眼前景像呈現的文化差異，與為文者對「禮」的認知、所謂符合「體統」的價值標準之間的扞格。就像日本人酗酒、露天入浴等被當時的臺灣人認為是「有禮無體」一樣。⁽⁹⁸⁾這樣的描述，形塑了另一種對櫻花的印象與觀感，也進一步表達出對櫻花美此一價值的不苟同與不欣賞，並將自身置於「櫻花國」之外。不過，在表述文化上的認同差距、劃開「他者」與「我們」的同時，仍可見到日本＝櫻花國的圖像深植其心。

隨著櫻花的發現、移植，以及紀行文、新聞的報導，原本距離遙遠的櫻花也逐漸走進臺灣人的休閒生活。以任職於《臺灣日日新報》的臺灣漢詩人們為首，1910年代開始，並不僅止於日人觀櫻宴上的座上賓，也開始主動邀約結伴前往竹子湖，從事觀景、賞櫻、吟詩、打獵、入浴等活動。⁽⁹⁹⁾值得注意的是，吟詩喝酒

(96) 關於臺灣民報在臺灣人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參見：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說〉，頁117-156。

(97) 〈東都花信〉，《臺灣民報》，1926年4月25日。

(98) 春城，〈五十年來北市見聞錄〉，《臺北文物》5：1（1956年4月），頁31。

(99) 伯儂子，〈竹湖觀櫻記〉，《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3月26日，第5版。伯儂子為魏清德的筆名。魏清德（1886-1964）號潤庵，新竹人，後遷居臺北萬華，1906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1910年辭去教職，應聘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1920年代後半更昇任漢文部主任。記者生涯直至1940年「臺日漢詩壇」廢除為止。關於魏清德的生平，參照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頁185-194；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說〉，頁68。由文中提及的人名，推測是臺灣人結伴賞櫻。同行者中可以確認的有楊仲佐（1876-1968），號嘯霞，又號網溪。世居永和網溪里，是北臺碩儒楊克彰次子。甲午之戰，隨父親克彰公內渡，住在廈門5年，1900年返臺，入《臺灣日日新報》任漢文部編輯約20年。國家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辭典》，線上版，http://www2.nmtl.gov.tw:8090/ug-9.jsp?xsd_name=entry&handle=2402。

賞花原就屬於傳統文人的活動，⁽¹⁰⁰⁾ 因此，被日人發現的櫻花可以說是在臺灣文人的交遊之中加入了新元素。

其後，配合櫻樹的大量栽植、論述的傳播、交通設備改善等諸多外在條件改變，原本對櫻花並不具特別情感的臺灣人也開始流連於櫻樹下，賞櫻不再只是文人雅士的專利。⁽¹⁰¹⁾ 1930 年代，臺灣人的觀光、旅行活動抬頭，⁽¹⁰²⁾ 一般大眾也會趁春節假期往郊外踏青賞櫻，滿植櫻花的山野成了臺灣人「游春」的勝景之地。甚至還出現專為臺灣人設計的「內地觀光賞櫻團」。⁽¹⁰³⁾ 也就是說，那些被在臺日人發現、移植，用以想像、懷鄉、簽畫記號的空間，以融入臺灣人傳統與新興休閒活動的方式走入生活情境中。只是，臺灣人的賞櫻很可能單純欣賞櫻花之美。即便透過各種言論情報得知道櫻花是「東瀛第一花」，⁽¹⁰⁴⁾ 知曉櫻花象徵武士精神，不見得就等於全盤接受同質的價值觀或意識形態。甚或也可能如同前引，當親赴日本內地賞櫻之際，對眼前的景象以另一番價值標準解讀。

六、從風景到感化力

(一)櫻的力量

1920 年代鼓吹移植櫻花的論述大抵仍以「內地人」為思考角度。皇太子行啓紀念植櫻之際，《臺灣日日新報》一篇社論寫到：「內地人無論傳統或先天皆對花有憧憬。因此由內地來到臺灣，最失望的便是三春行樂缺少了櫻花與梅花」，行文並以觀賞、感受「內地氣氛」為理由，期望政府能在適當處移植櫻樹。此文還提

(100) 例如林獻堂日記中可以看到觀梅作詩的活動。參見：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0)，頁 61。此外，上註中提及的楊仲佐，在郊外建溪洲別墅培養數十種蘭、菊，成為文人墨客交遊之所。參見：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0)，頁 445-446。

(101) 〈內地號／內地に無き臺灣の櫻〉，《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2 月 20 日，第 4 版。

(102) 曾山毅，《植民地台湾とツーリズム》，頁 303。1930 年代臺灣人旅行、觀光現象顯著大增的社會因素，曾山比較了各年代職工的所得，認為是可處分所得（所得中扣除日常基本開銷可自由利用的金額）增加，可運用於餘暇活動的額度較為寬裕，其中一部分使用於觀光娛樂。

(103) 〈竹南櫻花盛開〉，《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 2 月 7 日，第 16 版。〈本島人ばかりで内地の櫻見物〉，《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2 月 17 日，第 17 版。〈内地へ櫻見物の團體旅行〉，《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 2 月 7 日，第 9 版。

(104) 連橫，《劍花室詩集》(文叢第 94 種，1960)，寧南詩草，頁 58，〈東游雜詩〉。

到「櫻花與梅花的栽植，可以帶給殖民地生活一些調劑自不待言，亦是內地延長主義的一個表現。」⁽¹⁰⁵⁾此時，櫻花在「內地人」腦海中的圖像開始與當時的臺灣統治政策「內地延長主義」交融，認為栽植櫻花是將殖民地「內地化」、「帝國的延長」⁽¹⁰⁶⁾的展現。而櫻花論述與臺灣人扯上連結，則是待至 1930 年代以後。

1930 年代，日本內地軍國主義推向最高潮之際，初始作為死者的招魂與慰靈場所的靖國神社，轉變為祭祀為天皇盡忠的靈魂之所，櫻花的意象也從明亮幻化成死亡，散落的櫻花被美化、隱喻為為天皇犧牲的士兵們。透過教科書、學校唱歌、流行歌、大眾演劇，這種被政府操作的櫻花意象開始滲透人心。⁽¹⁰⁷⁾

約莫這一時期，藉由櫻花「同化」臺灣人的想法才正式在殖民地臺灣出現。1934 年 3 月，臺東廳廳長本間善庫⁽¹⁰⁸⁾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發表了一篇〈提倡臺灣島的櫻化〉。⁽¹⁰⁹⁾該文後來又刊登於《理蕃之友》及《臺灣時報》，⁽¹¹⁰⁾並在日人間引起極大迴響，成為此後栽植櫻花的重要論述。本間在文中寫道：

國民性藉由自然環境的感化很深，即氣候、風土、山川、草木等自然的要件。……比較臺灣與內地的自然界，不免吃驚其差異之大。大和民族的國民性，受到內地山河草木的感化很深，相對之下臺灣的自然要素缺陷，從島民同化上憂國的至情來說，不得深深感到有審慎思慮的必要。

欲問何為此島的大和心、朝日漂香山櫻花。

一首和歌道破其所在。不得不承認這是將我國民精神比喻為朝日下

(105) 〈花に對する憧憬の心 梅と櫻を大に移植せよ〉，《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2 月 29 日，第 3 版。

(106) 茅野澤久，《面白い臺灣》（東京：朝日印刷出版部，1924），頁 115。刀根為次郎，《樂しき臺灣》（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23），頁 22。

(107) 大貫惠美子，《ねじ曲げられた桜》，頁 177-179、202-246。

(108) 本間善庫（1885-？），福島縣出身，1912 年文官高等試驗合格，1919 年渡臺任臺北廳警視。其後長期擔任警務工作。1933 年自澎湖廳長一職，轉任臺東廳長。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頁 165。

(109) 〈臺灣島の櫻花〔化〕を提唱す（上）〉，《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3 月 23 日，第 3 版；〈臺灣島の櫻花を提唱す（下）〉，《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3 月 30 日，第 3 版。

(110) 本間善庫，〈臺灣島の櫻花を提唱す（上）〉，《理蕃之友》3:4（1934 年 4 月），頁 7。本間善庫，〈臺灣島の櫻花を提唱す（下）〉，《理蕃之友》3:5（1934 年 5 月），頁 4。本間善庫，〈臺灣島の櫻花を提唱す〉，《臺灣時報》，1934 年 5 月，頁 45-47。原文為日文。

漂香的櫻花，或說讚嘆朝日下漂香的櫻花是培養我國民精神偉大的力量。

本間爲文不斷強調「國民性」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並引用江戶時代國學者本居宣長的歌，將國民精神與櫻花連結，認爲櫻花是培養國民精神的偉大力量。他還認爲臺灣的自然單調無味沒有變化，無法培養住民的性情，爲「補足缺乏的自然要素，舉內地延長即所謂同化之實」，乃提倡、力勸櫻花的移植。以日本內地特有的風景捕捉櫻花是領臺初期以來一貫的視線，但是對照初期的「風氣相通」之說，此時著眼點轉變爲臺灣與日本自然環境的「相異」之處。因爲相異，才有「同化」的必要。於是櫻花便不再僅是供「內地人」思鄉的「風景」，更轉化爲代表「內地」風土，以培養國民情操的一種「力量」。

本間提倡移植櫻花除爲了「五百萬島民的同化」，尙有一重要考量，乃針對在臺日人的二世、三世，那些在臺灣出生長大的孩子們。他說：

渡臺多年，雖久未接觸故里家園的溫容，然自幼成長於內地之自然懷抱，何等幸運擁有珍貴的回憶與深刻的憧憬。

然彼等二世三世如何？不曉櫻梅；不曉紅葉；不曉霜雪；未知四季千種之花，未知山容水色之美。嗚呼！此乃無櫻花之島嶼、無紅葉之山河，爲人父母之哀。

在缺乏四季變化刺激的環境，爲了培養下一代的「感受性」，並建設一個子孫能夠永遠安住、埋骨之地，他認爲應以官廳之力遂行櫻花移植。在臺日人的二世、三世當時被稱爲「灣生」，亦即在臺灣出生長大之意，這個字眼當時帶有揶揄的意味。害怕這些「灣生」的孩子們不懂「母國」風物，日益「灣化」是當時在臺日人一世常有的憂慮。⁽¹¹¹⁾ 移植櫻花成爲培養感受性、認識日本風物的重要媒介與手段。

爲了「內地人」的後代主張移植櫻花的言論雖然此時才出現，但早在 1920 年代前後就已經有「內地人」兒童就讀的小學校種植櫻花了。以理科設備完善聞名的旭小學校 1917 年曾經栽植內地櫻作爲教材，不過因爲風土氣候的關係不曾開

(111) 當時許多造語附上「灣」字，經常意喻著在臺日人身處邊緣的位置，也隱含文化上的貶意。關於「灣生」、「灣化」，請參考顏杏如，〈「島都台北」に生きる〉，頁 10-15。

花，校長試著將之移往陰涼乾燥處，苦心照顧下，1925年終於開了花。⁽¹¹²⁾這件事當時成為新聞，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一方面可見到櫻花平地生長不易，眾人卻仍處心積慮培植；另一方面，就承傳而言，櫻花則為教育「灣生」的日本孩童成為「一般」日本孩童不可或缺的存在。往後，1940年春天，便有草山的植栽業者以美化校園、培養「兒童情操」和作為理科教育教材為名目，捐贈「內地櫻」160株、「臺灣櫻」98株給臺北市的各小、公學校。⁽¹¹³⁾然而礙於氣候條件，這些植於校園中的櫻花後來未曾聞其開花。如同旭小學校一般，校園中的櫻只有極其偶爾才為都市景觀點綴上些許嫩紅。⁽¹¹⁴⁾

(二)戰時之櫻

1940年為了「奉祝」皇紀兩千六百年，大屯國家公園設立「櫻委員會」，展開櫻花植栽事業。從1940年到1943年於紗帽山登山路和竹子湖等處栽種染井吉野櫻、緋寒櫻各5,000株。⁽¹¹⁵⁾

這一時期太平洋戰爭已經白熱化，代表日本傳統的門松等節慶的活動也被要求自律，相較之下，櫻花仍持續的栽植與移植則顯得格外醒目。為什麼在這「非常時期」仍然願意耗費龐大的經費與人力種植櫻花？〈櫻栽植趣意書〉中引用了「花即謂櫻，人即謂武士」的諺語，並且談到「相信可以幫助國民精神的昂揚」。⁽¹¹⁶⁾櫻委員會的常任理事大橋準一郎⁽¹¹⁷⁾於1942年1月12日林業懇話會的演講中，

(112) 〈臺北旭小學の校園に八年振で内地櫻咲く高燥な日蔭に植ゑれば平地でも開花するらしい〉，《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5月16日，第5版。另外，臺北州也每年送櫻花的標本至高等學校。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編，《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大屯國立公園内櫻植栽報告》，頁26。

(113) 〈校庭に内地櫻 島都の各小公學校〉，《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2月18日，第2版。

(114) 不過靠近山區的小學移植山上的櫻樹，透過新聞的報導，花開時經常成為賞櫻的去處。例如北新庄公學校、新店公學校。〈櫻を戀う人よ〉，《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2月2日，第7版。〈新店公園の櫻ほころぶ〉，《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3月10日，第3版。

(115) 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編，《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 櫻植栽事業実行報告概要》，《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大屯國立公園内櫻植栽報告》，頁1-2。

(116) 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編，《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 大屯國家公園内櫻植栽趣意書》，同上註，頁30。這句話意指花最美的是櫻花，人最優秀的是武士，原文為「花は櫻木人は武士」，出自《假名手本忠臣藏》的臺詞。

(117) 大橋準一郎(1883-1942?)，生於新潟，1909年東京帝大農科大學林學實科畢業後任同大學助手，赴臺灣實驗林，後歷任殖產局技手從事林業整理、臺北州技師、勸業課林務係長等等，1940年10月官制改正後，任職臺北州農林課。與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與南新聞社，1943)，頁61。

藉江戶後期著名的陽明學者賴山陽的和歌：「若望見開滿櫻花明亮的吉野春色，無論是唐人或是高麗人也將成為大和心」，⁽¹¹⁸⁾來說明「移植大和魂」的必要性，強調「在呼喚著皇民化的臺灣非植櫻花不可」。這樣的想法與上述本間善庫的言論有異曲同工之處，都認為櫻花是一種可以培養「皇國精神」的力量。事實上，櫻委員會的會議中，大橋確實也提到了本間數年前發表的言論。⁽¹¹⁹⁾

不過根據櫻委員會的開會紀錄，關於當時應該種植什麼品種的櫻花，以及種植的理由，其實會員們的想法很多樣，比表面上的「皇國精神」還來得複雜許多。例如臺北州協議會員的山本義信⁽¹²⁰⁾認為，有櫻花的地方就是「御稜威」（天皇的威光）所及之處，臺灣不必勉強種植內地櫻，改良臺灣原有的櫻花即可。持相反意見的臺北帝大教授日比野信一則認為臺灣的內地人不知道日本的櫻花，孩子們學習櫻花仍不知道什麼是櫻花，這與看緋櫻是不同的，因此期望能植內地櫻。也有人提醒大家不要忘記國立公園原本的使命，認為大部分植內地櫻並不宜。⁽¹²¹⁾會議的討論內容顯示，當戰爭進入「非常時期」，栽植櫻花與皇民化運動在輿論的表面上結合，但是潛伏於檯面下的，仍然保留延續 1920 年代以來「風致美化」、教育與日本風物脫節的在臺日人二世等想法，甚至從 1900 年渡臺的山本信義的發言還能看到領臺初期「有櫻花的地方終歸我領土」之說的殘影。無論討論內容為何，終究是打著「幫助國民精神的昂揚」旗幟登場，櫻花化身為「大和魂」而被移植。此時所謂的「大和魂」已不再是原意——一種純粹欣賞美麗幽深情懷的「大和魂」，⁽¹²²⁾而是被轉化為為國家犧牲付出的「大和魂」。若櫻、散華等以淒美壯烈美化死亡的戰爭語言亦自日本內地帶入殖民地臺灣。⁽¹²³⁾栽植櫻花時，「先遙拜宮

(118) 原文為「花より明るみ吉野の春の曙見わたせば もろこし人も高麗人も大和心になりぬべし」。

(119) 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編，《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大屯國立公園内櫻植栽報告》，頁 50、7。

(120) 山本義信（1881-1968），1900 年渡臺，經營炭礦業，歷任臺北州協議會員，板橋庄長等等，1936 年改正自治制度實施後續任臺北州會議員。與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頁 414。

(121) 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編，《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大屯國立公園内櫻植栽報告》，頁 17-26。

(122) 1930 年代最常被軍國主義「利用」的本居宣長的和歌，其初衷僅僅是「會發出美麗的讚嘆正是大和心」之意。參見：齋藤正二，《日本人と植物・動物》（東京：雪華社，1975），頁 126。另外，1900 年當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中確立了大和魂與櫻花的隱喻關係時，其所謂的「大和魂」並未散發狂信愛國主義的氣息，和本居的和歌本意一樣是陽性的，對天皇的忠誠，並未以士兵的死為前提。大貫惠美子，《ねじ曲げられた桜》，頁 187-194。

(123) 若櫻指年輕的士兵，散華比喻士兵如櫻花散落的壯烈犧牲。除了櫻花外尚有其他擬物化的戰爭語言。

城，然後獻上默禱，以示對戰歿英靈的感謝，和祈願皇軍武運長久⁽¹²⁴⁾的儀式也顯露出櫻花和為天皇效忠、為國家獻身的武士道精神之間確切的關聯。

這一時期，賞櫻郊遊活動也冠上了「提升體能」（體位向上）的口號，使得賞櫻本身不再是單純的休閒娛樂，出現了前所未見的象徵式活動。1940年臺北市教化聯合會⁽¹²⁵⁾主辦、趣味登山會協辦的草山賞櫻，有八百多人參加。健行抵達目的地後，懸掛國旗，遙拜宮城，默禱皇軍武運長久，做收音機體操，歌唱「兩千六百年頌」，另外還有演講和尋寶遊戲。翌年的賞櫻健行活動更以「為了明日力行職業戰線，鍛鍊身心，探訪象徵大和魂的櫻花」為理由，活動的內容大致與前一年相同，但增加了行進歌唱練習、劍舞話劇，結束時並三呼聖壽萬歲。⁽¹²⁶⁾這些活動內容說明賞櫻由欣賞風景的休閒娛樂轉變成皇民運動的一環，不但「櫻花」象徵國民精神的大和魂，賞櫻活動也成為鍛鍊身心的一種實踐。

1937年以後，當統治當局意圖藉由櫻花「同化」臺灣人，在賞櫻活動中加入許多儀式與規訓時，一些致力皇民化的士紳階級也在詩作中表現出對櫻花所象徵之武士精神的認同與追隨，例如黃純青⁽¹²⁷⁾的〈櫻花〉：「我愛櫻花稱武士。共開共落共存亡」。⁽¹²⁸⁾只是這樣的價值觀是否同樣深植一般大眾心裡，認同並實踐，尚有待更細緻的考究。但可以確定的是，櫻花在過去五十年間曾走進臺灣人的生活，或為都市外緣的風光景色，或於都市一隅驚鴻一瞥，而東瀛第一花、武士的壯烈犧牲等意象也普遍為眾人所知曉、所聯想。

參見：周婉窈，〈美與死——日本領臺末期的戰爭語言〉，收於氏著，《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3），頁185-213。

(124) 〈待たれる櫻花爛漫大屯山麓の櫻樹植初め〉，《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2月10日，第3版。

(125) 臺北市教化聯合會，1932年4月設立，事務所設在臺北市役所內，以促進社會教化事業和聯絡統合教化機關為目的。由臺北市內各小公學校、青年團、婦人團體等66個團體組成，臺北市尹為會長。參見臺北市役所編，《臺北市政二十年史》（臺北：臺北市役所，1940），頁377。

(126) 〈快晴にめぐまれ郊外へ溢れた市民〉，《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3月4日，第3版。〈咲いた櫻の下で一日の清遊 來月二日櫻ハイク決行〉，《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2月23日，第3版。〈緋櫻いま盛り〉，《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3月10日，第3版。

(127) 黃純青在1914年便設立全臺最早的「同風會」，後來又擔任皇民奉公會臺北州支部奉公委員。同風會相關研究可參見：林麗卿，〈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教團體與社會變革——以臺北州同風會為例〉（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17-19。王世慶，〈皇民化運動前的臺灣社會生活改善運動：以海山地區為例（1914-1937）〉，《思與言》29:4（1991年12月），頁5-7。

(128) 〈漢詩 櫻花〉，《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8月3日，第4版。

七、結語

風景規劃和營造，構成當時人們生活中一幅幅景色。其中除了牽扯權力運作、被期以控制、馴化「新附之民」，其他一些時候則來自內心情感的因素，及由自身處境出發的考量。透露出人們思鄉、享樂的望想，或身處「外地」並非永遠居於優勢的危機感。

至若臺灣栽種櫻花的歷史過程，更是感性的因素先於理性，生活情境的需求走在統治手段之前。就像早期（1910年代以前）專程前往路途遙遠的竹子湖賞櫻只是爲了思念家鄉的春天；統治當局開始移植櫻花之前也曾出現希望將櫻花也納入行道樹的聲音，理由不外乎是爲了離鄉的日人在外地仍然可以貼近「母國」的春天。1920年代的內地延長主義，對決策者而言是指改變統治臺灣人的政策，讓日本內地法律、權利義務部分適用於臺灣；然而對民間在臺日人而言，腦海裡熱切希望的「內地延長」，卻是能在「外地」擁有彷彿「內地」的景色。

另一方面，賞櫻和植櫻這原本基於「固有情感」的目光與行動，在視覺效果或名稱意義的賦予之下，使其於複製故鄉的風景外，還逐漸添加許多政治意涵。皇太子足跡所及之處的栽植，使得草山具有「皇威所及」的空間象徵性。皇紀兩千六百年的櫻栽植，則是一種「皇國的長久與永恆」的時間象徵。甚至，最早期在臺日人指稱的「母國風景」，都是經由想像與言論塑造出來的。因爲竹子湖原生緋寒櫻錯落的小品景緻，無論如何都不會像明治時期以後日本人熟悉的風景——視野所及的染井吉野齊開齊落。從原生櫻花的發現到日本櫻花的移植、臺灣櫻花的栽種，可以說是認識與想像循環交錯、符號層層累積的過程。這些論述與符號的累積，也顯現在臺日人「統治者」之外的面貌——「由日本本土向外移動」的一群人，不斷地在「外地」找尋與「內地」連結的符號及寄託。如此反思日治時期人群與空間的互動、城—郊風景、生活中的種種經營，也就能感受到較「統治—被統治」更複雜、多樣的、深刻的風情樣態。

從思鄉、風致保存、創造永住觀念、避免二世的「灣化」，到戰時爲了「同化」臺灣人、培養國民精神等，櫻花在不同時期的不同需求和理由下，不斷地被轉化包裝。郊野和都市隨著不同時代和背景種植櫻花。竹子湖、紗帽山登山道等地的

櫻則創造了休閒地的風景；學校、市場、庭院、遊廓的櫻構築出殖民城市的生活風景。郊野的櫻花跟隨交通設施與體育休憩活動興起走入人們非日常的生活之中；城市的櫻花提供一時的氣氛、趣味，也將「內地式」的生活圖像帶入殖民地臺灣，創造了短暫的「內地風景」。

日治時期城市栽種的櫻花如今已不復見其蹤影，山野移植的吉野櫻自移植以來就大多生長不佳，至今可見的多半是臺灣原生的緋寒櫻。然而，這些原生緋寒櫻，實則又經過當年從苗圃培育、栽植、照料，至今日幾經換植。這些被現今的我們所以為是「自然」的風景，其實是自日治時期以來既斷裂又延續、人工、大量、計畫性栽植所創造出的「人為的」空間。

本文嘗試梳理討論日治時期日本人在臺灣栽種櫻花的思想流變。櫻做為日本社會、文化傳統重要的象徵，以本文所著重移居海外新領土的在臺日人為對象的討論，恰可為主流與支流、傳統與新成之間牽扯糾葛的觀照。討論的空間場景雖以臺北為限，但從報紙可以大致看到臺灣全島的植櫻有著相似的歷程：中南部地區氣候條件寒冷的山地也有著發現、栽種、移植櫻花的動向；植櫻作為御大典紀念事業；植櫻創造勝景之地；遊廓、料亭移植櫻花的舉動等。⁽¹²⁹⁾ 櫻花意象的構築及其後的轉折，透過媒體言論的散播力量，可以說更是全島共通的。只是，不同地區的櫻花是否帶著共通意象外的地方色彩、⁽¹³⁰⁾ 其他生活圈中櫻花與民眾生活的關係如何等問題，則需要透過更為針對各地的深入考察才可知曉。

文中筆者也試著討論臺灣人對櫻花意象的形塑及其受日人言論影響的傳播路徑。但對於一般大眾而言，「認知」櫻花所象徵的價值標準與「身體力行」之間存在的距離與落差，特別是戰爭末期寄望成為培養「皇國精神」力量的櫻花是否真的達成效果？被轉化的櫻花意涵如何透過學校教育植入人心等等，這類涉及臺灣

(129) 因相關報導的數量頗多，僅列舉數則。如，〈虎頭埤櫻樹植付説〉，《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4月3日，第7版。〈臺中遊廓の櫻〉，《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2月12日，第5版。〈宜蘭短訊 試植櫻花〉，《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2月7日，第4版。〈臺南 小梅園の櫻〉，《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3月18日，第4版。〈八仙山神社に 內地櫻六百本 御大典記念に植ゑる〉，《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2月4日，第9版。〈獅頭山に植ゑられた桃櫻千五百餘本遊覽地としての各種施設著々として進捗〉，《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3月9日，第3版。

(130) 例如霧社櫻花花期較短，和日本內地的櫻花相似，因此當時也屢屢有人將之寫為「武者櫻」（日語發音和「霧社櫻」相同），但其中是否包含對原住民的意象等，則有待深究。〈內地號／內地に無き臺灣の櫻〉，《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2月20日，第4版。

人意識型態的問題，或者「灣生」日人對遙遠（甚或未曾謀面）母國的認識、想像，「櫻」的內涵與意象扮演了何種角色等，都還有待日後更進一步的深思探察。而這櫻一植物在人類文化的龐大傳統，其實也向我們揭示了人與植物、人文與自然在文明發展之中繁複卻永不止息的交流，這同時是時人與後人面對自我處在與外在環境的課題。

定稿日期：2007.12.1

引用書目

- 《臺灣民報》，1926年4月25日。
《臺灣日日新報》，1898-1944年。
みやかは花守
1908 〈造り花「士林より」の二〉，《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3月1日，第4版。
刀根爲次郎
1923 《樂しき臺灣》。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
又吉盛清
1996 《台湾 近い昔の旅》。東京：凱風社。
大屯國立公園協會
1943 《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大屯國立公園内櫻植栽報告》。臺北：大屯國立公園協會。
大貫恵美子
2003 《ねじ曲げられた桜——美意識と軍国主義》。東京：岩波書店。
大園市藏（編纂）
1916 《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
大橋準一郎
1943 〈大屯國立公園と櫻栽植〉，收於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編，《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大屯國立公園内櫻植栽報告》，頁40-58。臺北：大屯國立公園協會。
小川和佑
1993 《桜と日本人》。東京：新潮社。
山田孝雄
1941 《櫻史》。東京：櫻書房。
川上技師
1911 〈臺灣の櫻〉，《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2月22日，第3版。
中村忠誠（中村櫻溪）
1902 〈（詞林）竹仔湖觀櫻花記〉，《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4月16日，第1版。
中島春輔
1930 《臺北近郊の北投草山温泉案内》。臺北：臺灣案内社。
王松
1905 《臺陽詩話》。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王瀨等（編）
《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王世慶
1991 〈皇民化運動前的臺灣社會生活改善運動：以海山地區爲例（1914-1937）〉，《思與言》29(4): 5-63。
平野久美子
2007 《トウサンの桜》。東京：小学館。
本間善庫
1934 〈臺灣島の櫻化を提唱す（上）〉，《理蕃の友》3(4): 7。
1934 〈臺灣島の櫻化を提唱す（下）〉，《理蕃の友》3(5): 4。
1934 〈臺灣島の櫻化を提唱す〉《臺灣時報》，1934年5月，頁45-47。

田中秀明

2003 《桜信仰と日本人——愛でる心をたどる名所・名木紀行》。東京：青春出版社。

白幡洋三郎

2000 《花見と桜——〈日本的なもの〉再考》。東京：PHP 研究所。

伊藤銀月

1910 《日本風景新論》。東京：前川文榮閣。

仲摩照久（編）

1931 《日本地理風俗大系第十五卷（臺灣編）》。東京：新光社。

安藤廣重

1971 《名所江戸百景》。東京：共同通信社開発局複製魚屋栄吉安政 3-5 年刊本。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臺灣歷史辭典》，線上版，<http://taipedia.cca.gov.tw/taipedia/dict/welcome.aspx>

佐藤正藏

1937 《大屯山彙と温泉》。臺北：臺灣產業評論社。

佐藤俊樹

2005 《桜が創った「日本」——ソメイヨシノ起源への旅》。東京：岩波書店。

尾崎秀眞（尾崎白水）

1907 〈大東先生招赴觀櫻會植亭黃君詩先成因次韻賦四絕句〉，《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4 月 11 日，第 1 版。

志賀重昂

1894 《日本風景論》。東京：政教社。

李承機

2004 〈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博士論文。

杉山靖憲（編著）

1916 《臺灣名所舊蹟誌》。臺北：臺灣總督府。

貝原益軒

1973 《花譜・茶譜》。東京：八坂書房翻刻元祿七年一寶永元年刊國立國會圖書館白井文庫藏本。

周婉窈

2003 〈美與死——日本領臺末期的戰爭語言〉，收於氏著，《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 185-213。臺北：允晨文化。

東洋協會臺灣支部

1909-1919 《臺灣時報》。全 113 号。

林麗卿

1997 〈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教團體與社會變革——以臺北州同風會為例〉。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

2000 《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2000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邱函妮

2000 〈街道上的寫生者——日治時期的台北圖像與城市空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春 城

1956 〈五十年來北市見聞錄〉，《臺北文物》5(1): 28-45。

茅野灣久

1924 《面白い臺灣》。東京：朝日印刷出版部。

若林正文

1984 〈1923年の東宮行啓——天皇制の儀式戦略と日本植民地主義〉，收於平野健一郎編，《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文化の交流と摩擦》，頁195-234。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初山衣洲（衣洲植客）

1902 〈折花嘆〉，《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3月5日，第1版。

徐裕健

1993 〈都市空間文化形式之變遷——以日據時期臺北為個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土木研究所建築與城鄉組博士論文。

柴田圓治

1912 〈和歌〉，《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6月3日，第1版。

神崎宣武

1991 《物見遊山と日本人》。東京：講談社。

國家臺灣文學館

《臺灣文學辭典》，線上版，<http://www2.nmtl.gov.tw:8090/ug-0.jsp>

張玉書、汪霏等（編）

《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連 橫

1960 《劍花室詩集》，臺灣文獻叢刊第9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2 《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12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齋藤正二

1975 《日本人と植物・動物》。東京：雪華社。

1979 《植物と日本文化》。東京：八坂書房。

曾山毅

2003 《植民地台湾とツーリズム》。東京：青弓社。

陳慧如

2004 《臺灣櫻花旅行》。臺北：莫克文化。

黃美娥

2004 《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社。

黃茂清（黃植亭）

1907 〈木下大東先生家植櫻花三樹時方盛開設筵邀賞詩以紀之〉，《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4月9日，第1版。

楊永彬

2000 〈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收於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頁105-181。臺北：播種者文化。

葉倩璋

1996 〈植民地主義と都市空間——台北における権力と都市形成〉，收於竹内啟一編，《都市・空間・権力》，頁34-76。東京：大明堂。

農商務省山林局（編）

1924 〈紀念植樹〉，收於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林務課編，《苗圃及造林實行法・附錄》，頁1-21。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林務課。

臺北市役所（編）

1926 《臺北市案内》。臺北：臺北市役所。

- 1928 《臺北市案内》。臺北：臺北市役所。
1940 《臺北市政二十年史》。臺北：臺北市役所。
1942 《臺北》。臺北：臺北市役所。
- 臺北州（編）
不著編年 《臺北州公共浴場衆樂園案内》。臺北：臺北州。
- 臺灣山林會
1934 〈大屯山一帶の記念造林完成〉，《臺灣の山林》98: 46。
- 臺灣日日新報社企畫部（編纂）
1937 《臺日ハイキングコース（臺北近郊篇）》。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企畫部。
- 臺灣國立公園協會
1939 《國立公園寫真》。臺北：臺灣國立公園協會。
-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
1934 《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 臺灣總督府內臺灣時報發行所
1919-1945 《臺灣時報》。全302号。
-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
1924 《臺灣鐵道旅行案内》。臺北：臺灣總督府鐵道部。
-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1930 《臺灣鐵道旅行案内》。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1942 《臺灣鐵道旅行案内》。臺北：東亞旅行社臺灣支部。
- 蔡珮香
1907 〈步黃君植亭赴大東先生邀觀櫻會瑤韻〉，《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4月18日，第1版。
- 興南新聞社（編）
1943 《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
- 謝汝銓（謝雪漁）
1907 〈大東先生寓齋櫻花盛開治杯招賞賦此以謝〉，《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4月13日，第1版。
- 顏杏如
2003 〈「島都台北」に生きる——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外地経験と異文化接触〉。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修士論文。
- 魏清德（怡儂子）
1912 〈竹湖觀櫻記〉，《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3月26日，第5版。
- 羅秀惠（蕉麓）（譯）
1905 〈櫻花種界〉，《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4月6日，第3版。
- 羅秀惠（蕉麓）
1907 〈大東先生招赴觀櫻會譙詩以謝之〉，《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4月10日，第1版。
- 藤原仁一
1925 〈大屯山造林私見〉，《臺灣山林會報》15: 6-18。
- 瀧川政次郎
1971 《吉原の四季：清元「北州千歳寿」考証》。東京：青蛙房。
- 蘇碩斌
2002 〈臺北近代都市空間之出現——清代至日治時期權力運作模式的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鷺の家
1901 〈櫻の述懐〉，《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3月3日，第7版。

Japanese and Cherry Blossoms in Colonial Taiwan: Discovery and Transplanting of “Inland Scenery” and Transformation of Discourses about Cherry Blossoms

Hsin-ju Yen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ra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Japanese colonizers and their colonized space with a focus on Taipei, the most densely populated area occupied by the Japanese. As a case study,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hanging practices, concepts, and meanings of cherry-tree planting on Mount Grass (Yang Ming Mountain) in suburban Taipei. Drawing upon old newspapers, magazines, tour guides and reports, the paper also describes the changing contexts of, and the dynamics between, urban and suburban lif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discovering, planting and transplanting cherry trees reveals that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colonial period, the Japanese viewed cherry blossoms as the symbols of their “motherland” and “home country.” The government’s early initiative of transplanting mainland cherry trees to Taiwan was also triggered by the idea of protecting some aspects of Japanese “inland (naichi) scenery” which they had found in Taiwanese “overseas territory (gaichi).”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planting and transplanting, different symbols and meanings had become associated with cherry blossoms, i.e. Japanese tried to rationalize the unique image of “the country of the cherry blossom,” to project and even transplant mainland landscapes onto Taiwan, and to ultimately transform Taiwan into an extension of Japan Proper (naichienchō) . By the 1920s, however, discourses emerged with a new idea of using cherry tree transplantation to encourage Japanese permanent settlement in Taiwan and to prevent the “Taiwanization (wanka)” of Japanese children on the island. Thus, the policy of planting cherry trees also responded to the challenge of several obstacles that the Japanese encountered in their overseas colonies. Nevertheless, the idea of using transplanted cherry trees to assimilate the Taiwanese and to enhance “nationalistic sentiments” did not become popular until the late 1930s.

The above-mentioned phenomena illustrate that landscape design not only involves power manipulation, but also reveals Japanese immigrants’ nostalgia and a

sense of crisis. As the Japanese anxiety intensified, they realized that living in an “overseas territory” did not necessarily mean securing permanent advantages for them.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space, between city and suburbia, and between colonial politics and mundane daily living reveal a much more complicated dynamic than simply a power paradigm between “the rulers and the ruled.”

Keywords: Japanese in Colonial Taiwan, cherry blossoms, scenery, landscape, Taipei, space, urban Life